臺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頁 269～322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感傷的力量：

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正典化歷程與社會文化意義

潘　少　瑜*

提　　要

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可說是近現代中國的革命正典，它既是黃花岡精神的標準教材，也是中文世界最著名的情書，其特殊之處乃在於作者的革命先烈身分，以及書信內容對私人情愛與家國情感之推擴論述。本文透過對近現代報刊文獻與中學國文教科書的分析，將林覺民的先烈形象和〈與妻訣別書〉加以「歷史化」，梳理清末民初時期的社會歷史與言情話語脈絡，考察這封深具「感傷的力量」的書信如何由「私」到「公」，從個人的情書轉變為革命正典的複雜歷程，及其所映射出的社會文化意義與影響。

關鍵詞：黃花岡烈士、林覺民、〈與妻訣別書〉、國文教科書、感傷的力量

本文於 103.01.26 收稿，103.06.11 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DOI:10.6281/NTUCL.2014.06.45.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entimental Power: The Canonization and Socio-Cultural Significances of Lin Juemin's "Farewell Letter to My Wife"

Shaw-Yu Pan*

Abstract

Lin Juemin's (1887-1911) "Farewell Letter to My Wife" *(Yu qi juebie shu)* can be seen as a canon of Nationalist revolutions, which represents the orthodoxy of the "Huanghua Gang" spirit. Interestingly, it is also the most famous love letter in modern Chinese-speaking world. While Lin Juemin has been recognized as the major martyr of the Huanghua Gang Uprising in 1911, this love letter expresses the author's personal feelings towards his wife and country in a romantic tone. By analyzing various documents from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s, as well as different editions of "national literature" *(guowen)* textbooks, this paper aims to historicize the canonization of Lin's image as a revolutionary martyr and the journey of his love letter, which embodies the "sentimental power" and traveled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om the private to the public sphere. Furthermore, it examines the contemporary sentimental literaratur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socio-cultural significances and influences of this special letter.

***Keywords*: martyrs of Huanghua Gang, Lin Juemin, "Farewell Letter to My Wife," textbook of national literature, sentimental powe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感傷的力量：

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正典化歷程與社會文化意義*

潘　少　瑜

一、前　言

美國學者 Jane Tompkins 曾論述《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1852）對於十九世紀西方讀者的廣泛影響，認為雖然以現代批評家的眼光來看，作者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文筆過於煽情，且敘事冗雜，因而未能躋身文學經典，但它卻能深深感動當時的讀者大眾，甚至成為南北戰爭的導火線之一，其文本中「感傷的力量」（sentimental power）應為重要的原因。這種特殊的情感力量，主要來自於書中人物和情節對基督宗教意象觀念的召喚與對應，能喚起大眾的情感認同，針砭時事，而其「通俗劇式」（melodramatic）的情節，以及多愁善感的文字風格（sentimentalism），更增強其動人效果。大眾讀者受其悲歡離合、高潮迭起的故事所吸引，在不知不覺中認同書中主角，

* 本文初稿發表於 2009 年政大中文系主辦「第八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本研究所需之稀有報刊資料蒐集匪易，幸得祝均宙、孫麗瑩、鍾欣志等師友之熱心協助，而在論述觀點和整體架構方面，則要感謝匿名審查人、李歐梵、鄭文惠、廖肇亨、王瓊玲、蔡祝青等諸位教授的寶貴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接受作者所提倡的思想觀念，遂化為實際行動，甚至釀成廢奴風潮。[1] 如此看來，擁有「感傷的力量」的通俗文學，對於大眾觀念之形塑與改革的功用，不可小覷。若以此一視角觀照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當時文壇所盛行的正是具有感傷情調和憂國情懷的文學作品，無論是譴責小說或言情小說，均不免血淚交織，悲壯哀豔，[2] 欲對讀者說之以理，動之以情。然而，落實到政治層面上，革命話語如何打動人心？革命黨如何運用「感傷的力量」來宣傳革命？革命話語和大眾文化之間的關係為何？這些都是值得追問的課題。

若要舉出近現代革命話語中「感傷的力量」的代表作，非林覺民（1887-1911）的〈與妻訣別書〉莫屬，因為其他革命黨人所留下的書信文稿，多半已被淡忘，唯獨這封文情並茂的情書膾炙人口，且在大眾文化中持續發揮作用。辛亥廣州三二九之役前夕，同盟會會員林覺民在一方白手帕上寫下與妻子陳意映訣別的書信，在他被捕就義之後，由友人轉寄至家中。林覺民下筆之時，絕不可能預料到，這封私密的家書將在十餘年後被披諸報端，廣為刊佈，又被選入中學國文教科書，成為無數學子琅琅上口的文章，甚至化為戲劇、電影、流行歌曲的主題。換句話說，這封信的「來生」（afterlife）遠比它的作者所期待的漫長得多，也精彩得多。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是黃花岡[3] 革命精神的正統教材，也可說是中文世界最著名的情書，它的特殊之處，在於作者林覺民的革命先烈身分，以及信件內容對私人情愛與家國情感之推擴論述。就林覺民的身分而言，大眾對於革命先烈的想像，自有其形塑之過程，因而必須由清末革命報刊的宣傳策略著手探討之；就信件內容而言，愛情和愛國兩大時代命題

1 （美）Jane P. Tompkins, *Sensational Designs: 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Fiction, 1790-1860* (聳動的設計： 1790 至 1860 年美國小說的文化工程)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23-127, 134-139.

2 參考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收入《陳平原小說史論集（中）》（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874-882。

3 「黃花岡」一詞後又作「黃花崗」，本文主要遵循清末原始資料之用法作「岡」，引文部分則按照各資料出處之寫法，分作「崗」或「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間的矛盾與調和，乃是清末民初革命論述和言情文學的關注焦點，在這樣的文化背景孕育之下，方有「化小愛為大愛」的〈與妻訣別書〉之誕生，因此時代背景和文本脈絡的追索，也是本文的重要主題。這封信並不是文學天才匠心獨運的傑構，也不是超越社會歷史的存有物，它之所以能接觸到不同世代的廣大讀者，乃是特定政黨、媒體與國家教育機制積極運作的結果。因此，本文透過對近現代報刊文獻與中學國文教科書的分析，[4] 將林覺民的先烈形象和〈與妻訣別書〉加以「歷史化」（historicize），梳理清末民初時期的社會歷史與言情話語脈絡，考察這封深具「感傷的力量」的書信如何由「私」到「公」，從個人的情書轉變為革命正典的複雜歷程，及其所映射出的社會文化意義與影響。

就筆者所見，許多學者對於〈與妻訣別書〉的研究，偏向於作品賞析或教學經驗的分享，再加上一些感嘆先烈偉大精神、痛惜今非昔比的詞句，較少對該文進行脈絡化（contextualize）的探討，因而難以產生突破性的論點。[5] 另一方面，晚近漢學界對清末民初言情話語的研究方興未艾，舉凡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轉化、域外言情小說的譯介、「革命加戀愛」的小說類型、現代情書出版風潮的興衰……等相關議題，皆已獲得豐富的研究成果，[6] 然而對現代中國讀

4 由於中國大陸和其他華人地區之中學語文教科書取得不易，也為了避免模糊論述焦點，本文的分析對象僅限於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地區的中學國文課本。

5 例如潘宏：〈革命者的大愛情懷——林覺民〈與妻書〉賞析〉，《語文建設》2012 年 18 期，頁 53-54；王岩森：〈奇男子的真情文字——讀林覺民〈與妻書〉，《朔方》2008 年 8 期，頁 56-57；趙景雲：〈英雄本色兒女情長——林覺民〈與妻書〉賞析〉，《新聞與寫作》2006 年 5 期，頁 39-40；張覺：〈熱血凝成千古文烈士浩氣永長存——林覺民〈與妻書〉研析〉，《明道文藝》317 期（2002 年 8 月），頁 114-123；桑地：〈林覺民〈與妻書〉的前緣後事〉，《福建黨史月刊》2001 年 2 期，頁 20-21；林滋民：〈我教〈與妻書〉〉，《語文學刊》1998 年 6 期，頁 47。

6 例如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心的革命：中國的愛情系譜，1900 至 1950 年)(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Bonnie S. McDougall, *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Modern China: 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現代中國的情書及隱私：魯迅與許廣平的親密生活)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劉劍梅著，郭冰茹譯：《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影響深遠的〈與妻訣別書〉卻幾乎從未被納入討論範圍，這毋寧是相當令人詫異的。究其原因，或許是出身西方背景的漢學家，從未有機會接觸此文本，因為它既非文學經典，也不被包納在文學史的論述裏；而熟讀這篇文章的華裔學者，卻只把它當作一篇中學的課文，並沒有意識到它在近現代文學與文化史上的意義。

有鑑於此，筆者嘗試走出窠臼，將當今學界對清末民初言情話語的研究成果，納入對〈與妻訣別書〉的探討之中，以論證這封情書乃是近現代文學與文化史上饒富深意的個案，它所具有的「感傷的力量」，是清末以降的革命論述背後的重要動力，在被大眾媒體和國家機器挪用之後，對近代中國的社會文化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本文首先探討清末革命報刊如何利用文學手法來建構和宣傳革命黨（包括林覺民）的形象，而這種手法又和清末民初的言情小說有何種互動關係；其次考掘〈與妻訣別書〉的正典化歷程，說明其中政治利益的糾葛，以及這封情書被選入國文教科書之後，歷屆編者對它的刪改與詮釋，如何影響其教育功能；接著分析〈與妻訣別書〉文本，[7] 試圖擺脫正典化歷程所加諸其上的意識形態詮釋方式，探究其真正意涵；最後則附論林覺民和〈與妻訣別書〉在兩岸三地所催生的琳瑯滿目的通俗文化商品，並闡釋其社會歷史意義。

二、革命報刊對黃花岡烈士形象的塑造

（一）「顧影知是英雄，且屬美少年」：烈士的外表和就義經過

要了解林覺民的形象建構過程，必須從清末革命報刊的宣傳策略談起。蓋

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年）。

7 筆者所採用的〈與妻訣別書〉原文主要根據《廣州民國日報》的「黃花號」所刊之〈林覺民寄妻書〉（1924 年 5 月 2 日 2、3 版），但由於臺灣地區圖書館現存之「黃花號」影本及微卷頁面破損嚴重，故參校張天化編：《血花集》（上海：民智書局，1928 年），以補其缺漏文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末輿論「對於昌言革命的人，差不多非笑嘲謔，無所不至」，[8] 使得革命黨備感孤立無援，而保皇黨的機關報對革命黨的攻訐更是不遺餘力，例如：

> 夫今日之自稱志士，自稱救國者，莫如革命黨矣，然而觀其人格，考其行事，則固令人生鄙棄心，而不得不排斥之者。吾嘗考其入黨之人，厥有數種。最上者則少年無識之留學生也。……其次則愚昧無知之咕哩（按：即苦力）也。……又其次則為失志之士也。……又其次則為敗德之群小也。……嗚呼！此所謂革命黨之人格也。以彼之人格，例彼之行事，無怪顛倒錯亂，漫無方針。[9]

保皇黨的誣蔑，自然引起了革命報刊的反唇相譏，而三二九之役的發生，恰好成了洗刷黨員污名和鼓吹革命的最佳機會。為此宣傳最力的，便是于右任、張靜江、楊篤生等人在上海創辦的《神州日報》和《民立報》。

相較於當時的幾家大報（如《申報》、《新聞報》、《大公報》等）對於三二九之役的冷淡反應或懷疑態度，《神州日報》和《民立報》可謂傾全力報導此次轟動廣州的起義事件（時稱「粵亂」），大幅刊登相關新聞，[10] 直到事後兩三個月仍有零星文章見報。這兩份革命報刊多次以「某某小史」或「革黨某某小史」為標題，報導殉難黨人的生平，而旁邊又往往襯以描述滿清官場如何腐敗的新聞（例如官員賭博、喝花酒、養小妾等），其攻擊清廷、為革命張目之意相當明顯。《神州日報》和《民立報》對黃花岡烈士的描寫，不但強調他們的年輕和優秀（因此絕非「少年無識之留學生」或「愚昧無知之咕哩」），更特意突出他們英俊瀟灑的外表與慷慨豪邁之氣，其中包括「年貌英偉」的龐

8 陳布雷：〈在黃花岡烈士紀念會演說詞〉，孫云遐編：《初級中學國文》（臺北：復興書局，1952 年），第 2 冊，頁 25。

9 明公：〈革命黨之人格〉，原刊於《南洋總匯新報》（1908 年 8 月 10 日），收入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 卷，頁 17。

10 在清末的大報中，《時報》所刊登的革命相關報導雖然最多，言論也較偏向支持革命，但仍不像《神州日報》和《民立報》那樣積極為死難黨人立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雄、[11]「丰儀清雅，軀幹修俊，聲如金石，目若明星，精光射人」的林文、[12]「貌奇偉而微黑，大口隆準，目光炯炯如電，英氣勃發」的陳與燊、[13]「英姿颯爽，風骨偉岸，目瞬如電，生有神力」的林尹民、[14]「美丰姿，齒白如貝，修眉入畫，目有精光，身輕趫」的陳更新、[15]「美儀狀，眉宇英特，意致瀟灑，目灼爍如流星」的林覺民、[16]「姿貌魁秀，饒有膽志，雙眸炯炯，果毅多力」的方聲洞、[17]「白晳而曜，目如秋水，澄澄可鑑」且「端重瘦弱如處子」的陳可鈞、[18]「風儀修偉，志意廓然」兼「白晳灑脫，藹然可親」的劉元棟[19]等人。記者所使用的修辭手法，使得號稱「紀實」的新聞報導，兼具了通俗小說的文學趣味。革命黨裏既有風度翩翩的白面書生，也有「飛將軍」和江湖豪傑，怎不教人感奮崇拜？

除了文字描述之外，更有圖為證。《神州日報》和《民立報》陸續刊出多位黃花岡烈士的照片，[20]而在林尹民小影的旁邊，又特別以大字註明是「革命黨中之美少年」。[21]當讀者看到這些俊秀瀟灑的革命黨員全都英年早逝，想必會油然而生一股悲哀憐惜之情，《南越報》上所刊登的粵謳〈黃花影〉，便簡單扼要地道出了時人對黃花岡烈士的觀感：「黃花影，尚帶住的血痕鮮。顧影

11 《神州日報》2 版（1911 年 5 月 8 日）。
12 〈林文小史〉，《神州日報》2 版（1911 年 6 月 4 日）。
13 〈陳與燊小史〉，《神州日報》3 版（1911 年 6 月 22 日）。
14 〈林尹民小史〉，《神州日報》3 版（1911 年 6 月 27 日）。
15 〈陳更新小史〉，《神州日報》3 版（1911 年 7 月 7 日）。
16 〈革黨林覺民小史〉，《民立報》3 版（1911 年 7 月 20 日）。
17 〈方聲洞小史〉，《神州日報》3 版（1911 年 8 月 2 日）。
18 〈陳可鈞小史〉，《神州日報》（1911 年 8 月 13 日 2 版、8 月 15 日 3 版）。
19 〈革黨劉元棟小史〉，《神州日報》3 版（1911 年 10 月 16 日）。
20 在 1911 年的 7、8 月間，《民立報》陸續刊出趙聲、宋玉琳、方聲洞、陳與燊、林文、劉六湖等人的照片；而《神州日報》則刊出林文、林尹民、陳與燊、陳更新、林覺民、陳可鈞、方聲洞、劉元棟等人的照片。
21 《民立報》第 3 頁（1911 年 7 月 1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知是英雄，且屬美少年。」[22] 烈士的外表、年齡、人格特質，乃是革命宣傳的重點，革命報刊意欲透過這樣一群美少年的犧牲，喚起國人的良知與感傷。黃花岡烈士們的革命行動呼應了梁啟超在十餘年前提出的「少年中國」想像，他們不但具有「青春」、「希望」的積極特質，更體現了現代性的表徵，以及「革新」、「進步」等關乎新國家的憧憬。[23] 然而，與梁啟超那富有辯證性的「返老還童」理念相較之下，革命報刊中文明開化的革命黨美少年和頑固腐敗的清廷官僚的對立，即代表著現代「少年中國」與傳統「老大帝國」的決裂，少年必將取老朽而代之，二者之間並沒有迂迴游移的空間。

除了他們出眾的外表，革命黨人就義的經過，也是《神州日報》和《民立報》報導的重點。這些烈士的英雄事蹟，透過記者繪聲繪影的描述，幾可謂驚天動地。例如〈林尹民小史〉：

> 尹民偕諸鄉人同志轟攻督署，嗔目大呼，所向披靡，方殺二十餘人，及見廣塵中彈死，益不堪其憤，喑啞跳盪，目幾突出，精光如炬，擲彈發槍而前，摧陷官軍如拉朽，身被數十創，徧體為赤，而氣益奮，戰益疾，怒吼如雷，聲動天地，官軍皆驚而潰，卒以血湧，飛彈中腦，血湧如注，遂仆，亦慘矣哉！[24]

〈革黨馮超驤小史〉：

> 君被多創，鮮血傾溢，竟體流離，猶左彈右鎗力戰，剎那間，胸中十餘矢，尚挺立，握鎗而顫，面又中一矢，驀然遂仆，嗚呼烈矣！[25]

〈革黨林覺民小史〉：

> 君揮彈當先，直入署內。巷戰既久，飛矢洞腰，翻然身仆於地，縱聲一呼，忍痛躍起，復殺多人，又被數創，鮮血暴注，徧體淋漓，力竭始見

22 轉引自梁群球主編：《廣州報業（1827-1990）》（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49。

23 參考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19卷1期（2001年6月），頁256。

24 〈林尹民小史〉，《民立報》第3頁（1911年6月28日）。

25 〈革黨馮超驤小史〉，《民立報》第3頁（1911年8月30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擒。[26]

〈方聲洞小史〉：

身被創，忍不顧，戰益力。敵來愈多，四面環攻，君素趫捷，怒眦欲裂，從容揮彈，突擊自如，共殺哨弁兵勇等三十餘人。背負刃，腦中矢，血流徧體而氣不衰，彈盡矢窮，卒力戰而死。[27]

記者極力描摹渲染革命黨與清廷兵卒肉搏血戰的過程，強調黨人以一當百、奮戰不懈的精神，讀來驚心動魄，不但鼓動了讀者的熱情，也幫助製造了同情革命的輿論。但是這些革命黨人血戰就義過程彼此之間的相似性，以及高度程式化的敘事語言，也令人不禁懷疑其描寫究竟是否真切，或不過是通俗歷史演義傳統支配下的套式。蓋此類英勇事蹟在歷史通俗演義中頗為常見，例如《三國演義》第十六回，猛將典韋為保護曹操，以寡敵眾，血流滿地而死；又如《楊家將演義》第十五回描寫高懷德「臂中巨弩，拔矢灑血復戰，手斬番兵數十」[28]等，記者所撰寫的革命黨傳記及相關報導，情節和筆調均與此相近，與其說是紀實，恐怕更像是歷史演義寫作公式的套用，而帶有相當程度的虛構性。在記者的筆下，死難的革命黨人被神格化了，他們有如傳奇英雄，在刀光劍影的戰場上廝殺，直到彈盡援絕、身受重傷，仍不肯倒下。這樣震撼的畫面必然極度地刺激著讀者的想像，喚起了他們對烈士的崇敬。

《神州日報》和《民立報》在革命烈士形象的塑造過程中扮演著主要角色，它們文學性的修辭策略和宣傳成果得到黨人普遍的肯定。例如陳布雷即認為《神州日報》把握了三二九之役的機會來鼓吹革命，獲得可觀成果：

他們很詳盡的登載了舉事和死難的經過，很精細的描寫死難烈士的家庭情形和傳記，很藝術的介紹死難烈士的遺容和遺墨。這一來，直使得天

26 同註 16。

27 同註 17。

28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頁 104；明・熊大木編撰，穆公標點：《楊家將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下震動。向來寂寞寡情的青年覺悟了，向來懷疑革命的老輩，因憐才觀念而流淚了，向來輕視革命勢力的清廷官僚，震懼得不可名狀了。……黃花岡烈士的死難，在事實上沒有寸土尺地的成功，而精神上實在是推翻清廷的主力。[29]

如果沒有革命報刊的大力宣傳，黃花岡起義的影響或許不會如此深遠。至少就革命黨人的觀察認知而言，革命報刊的文學性報導的功效主要在於鼓動人民情感，那使得青年覺悟、老輩流淚、官僚震懼，並間接促成了數月後武昌起義成功的，[30] 應可說是革命話語中所蘊含的「感傷的力量」。

（二）「黃花岡下，玉淚飄香」[31]：英雄美人的浪漫插曲

《神州日報》和《民立報》對黃花岡烈士的文學性報導，美化了革命黨的形象，使得他們儼然成為一個「偶像團體」，而描寫烈士和女性之間的軼事傳聞，也是革命報刊為三二九之役增色的手法之一，更為日後言情小說的寫作者提供了靈感。在黃花岡烈士們入土之後不久，民眾開始自發地前往墳前弔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少女：

> 七十二革黨叢葬黃花岡，好事之徒每攜隻雞斗酒，登臨憑弔，此鸚鵡名士之結習，非必持何種主義也。二十五日，復有少女四五十人，乘坐肩輿，携帶花圈花球無數，由大南門入城，出東門，直達黃花岡，群以花圈花球置塚前，行鞠躬禮，欷歔流涕，徘徊至數小時，始行聯袂歸去。時觀者見諸婦女淡裝素服，如不勝情，中有西婦五六人，疑皆大家閨秀云。[32]

29 同註 8，頁 25。

30 馮自由：〈上海神州日報小史〉，《革命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頁 259。

31 〈花花絮絮〉，《神州日報》6 版（1911 年 7 月 17 日）。

32 〈粵亂後之血花淚史 • 紅顏弔革黨〉，《民立報》第 2 頁（1911 年 6 月 29 日）。當天其他報紙亦有類似報導，例如《神州日報》2 版的〈廣東亂後拾遺記（十二）• 英雄贏得美人憐〉，而《時報》3 版亦有〈廣東亂後之影響 • 黃花岡上之紅顏白骨〉一文，照錄某「粵報」之說，並在文後附註云：「此事未悉確否，姑照錄以誌異。」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報導的標題均強調「紅顏」、「美人」和革命黨的關係。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篇報導不僅描述了少女們西化的祭拜儀式（獻花圈、行鞠躬禮），更重要的是點出了她們的裝扮均為「淡裝素服」，她們的身分「疑皆大家閨秀」（還包括五六位「西婦」[33]），可見這群少女是受過西方文明洗禮的、有身分地位的女性，也唯有這樣的女性，才配得上黃花岡烈士。至於那些觀念行事較為傳統的女性，則淪為被調侃的對象，例如《神州日報》便有一則「革黨作祟」的報導：

> 老城雅荷塘孫氏女年及笄，因此次革命，驚恐成病，終日譫語，咸稱黨黨不絕，其家人竟指為革黨作祟，四出張羅符籙，現女已漸覺甦醒，愚黠者遂謂符籙有驗。或言革黨中多美少年，女蓋有所感觸也，然乎？否乎？[34]

記者促狹地將這位少女受到革命亂事驚嚇的反應，說成是她思春所致，因為革命黨中「多美少年」。看來，革命黨不僅能招徠有志之士，還能吸引懷春少女，革命行動於是染上了一層朦朧的情欲色彩。

根據革命報刊的標準說法，烈士的遺體之所以會葬在黃花岡，是因為黨員潘達微向地方士紳和善堂爭取的結果，[35] 但在當時還有另外一種香豔的傳說。黃世仲的「近事小說」《五日風聲》（1911），鉅細靡遺地描述了三二九之役的來龍去脈，也揭露了烈士們之所以被葬在黃花岡的「真正」原因：

---

33 當天《神州日報》的報導不直言「西婦」，而曰「作西婦裝束者」，意謂這群女子的真實身分未必是外國人。見《神州日報》2 版（1911 年 6 月 29 日）。

34 《神州日報》（1911 年 5 月 23 日）。

35 〈黨人免葬於戮犯叢葬之臭崗〉，《香港華字日報》2 版（1911 年 5 月 5 日）：「初四日，廣仁、愛育、方便、廣濟各善堂奉政界函知，收埋當場轟斃各亂黨屍骸計七十三具，兩縣初擬統葬東門外臭崗（即平日戮犯叢葬所），善董徐樹棠等，以善堂收葬各骸，向另有地，正未解決，有河南潘達微往江紳處陳請，願幫同各善董料理殮理各事，當由江紳電商善堂，許其同往。各骸發賬，有棺小不能容者，均另易棺，統葬於大東門外之黃花崗。」《時報》和《民立報》的報導均與此雷同，見《時報》3 版（1911 年 5 月 9 日）；〈魂兮歸來黃花之崗〉，《民立報》第 3 頁（1911 年 5 月 9 日）。按：原本的七十三具屍體中包含了一名清兵，後被人發現，將其另葬一處，故黃花岡所埋之屍為七十二具。見〈七十二人之墓〉，《民立報》第 3 頁（1911 年 5 月 9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黃花崗者，向為東門外之荒地，與息鞭亭相密邇。向則人跡罕至，自附近有金嬌墓者，墓門裝飾華麗，時人多以美人芳塚目之。金嬌固大沙頭之名妓，自大沙頭被火，玉沉於火坑，厥後官紳數人為營葬於該地，並為飾其墓門。於是遊人漸盛，而息鞭亭一帶，時留轍跡轡絲。某氏以為葬黨人於該地，則烈士美人，墳墓遙遙相對，而青山常在，則遊人過客當多興感焉：既足紀念於從前，亦足留佳話於此後也。[36]

這樣的說法看似突兀，為國家犧牲奮鬥的革命烈士怎麼能和送往迎來的名妓比鄰而居？但是革命色彩鮮明的《南越報》刊出此文，應該不是為了貶低烈士的地位。自古英雄配美人，黃花岡烈士自然也不例外，烈士與名妓的組合，正如過去的才子佳人傳奇，能夠引起人們無限的遐想。到了民國初年，李定夷的長篇小說《茜窗淚影》（1914）仍提及此事，只不過當初是烈士藉名妓之墓而傳，後來則是名妓之墓附烈士驥尾而增價。[37]

辛亥廣州之役死難革命黨員的數目原不只七十二（據報共有八十六人，甚或更多），[38] 之所以號稱七十二烈士，除了潘達微當初收葬七十二人的屍骨於黃花岡的事實之外，也是取其成數，予人水滸「七十二地煞」之聯想，凸顯革

36 黃世仲：《五日風聲》（桂林：灕江出版社，1988 年），頁 164；帝民：〈黃花塚記〉，一笑生輯：《繪圖真像廣東近事革黨潮》（出版地不詳：世界最新書社，1911 年），頁 193：「越城東北，名勝之地，不可勝數：越王臺，索馨斜；金嬌墓，英雄兒女，今古欽慕。彼黨人之大逆不道，死何足惜？而乃得留迹是間，一薰一蕕，益足令人感慨。」

37 見李定夷：《茜窗淚影》，收入《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 53 冊（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 年），頁 399：「姊亦知黃花崗畔，尚有數勝迹可附尾而彰者乎？附近有梅花崗張二喬之幽宅也，又有金嬌墓，亦名妓埋香之所，……黃花、梅花兩崗，前後相去殆三百年，二喬為吾粵名妓，死後，詩人黎美周為葬於此，墓旁梅花栽植萬株，後人因以名之。三百年來，日就衰落，今黃花崗上，俎豆千秋，而寂寂梅崗，蔓草荒煙，欲尋其迹而不可得。」

38 關於三二九殉難人數的統計和爭議，參考呂芳上：〈辛亥三二九廣州之役〉，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一篇「革命開國（一）」（臺北：國立編譯館，1985 年），頁 536-537、544，註 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命烈士們勇武的氣魄，增添神秘命定之色彩，有助於革命的宣傳。然而在《神州日報》上，卻出現了一則異想天開的趣味文章：

> 女士問：「革黨死者七十二人，都慷慨激昂，惟但懋辛一人自首，子意亦有說乎？」余誦前人詩曰：「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上句以二乘之得七十二，下句以二除之得一，正符其數。[39]

「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兩句豔詩，據傳是民初「鴛鴦蝴蝶派」名稱的由來，[40] 對今天的讀者而言，將「鴛鴦蝴蝶」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相提並論，簡直不倫不類，然而這樣的說法，或許正表現出當時民眾對於烈士們兼具英雄氣魄與兒女情懷的想像。三十六對鴛鴦與七十二位烈士的數字巧合，將革命烈士的悲劇命運和男女之情聯繫起來，前人的豔詩竟成為他們的讖語。更何況，在三二九之役中殉難的烈士們，也可說是某種意義上的「同命鴛鴦」，為了革命志業一同「殉情」，他們振興國族的激越豪情和對異性情愛的熱烈追求，正是異曲同工。遠承晚明文人周銓「惟兒女情深，乃不為英雄氣短」之說，「兒女英雄」的觀念在清末民初十分流行，人們認為最值得崇敬的英雄典範，並非絕情去欲的魯直漢子，而是俠骨柔情的兒女英雄，[41] 兒女之情未必會削減英雄之氣，反而能讓英雄更有人性的溫度，因為唯有深於情者方能真正懂得愛國愛家。環繞著黃花岡烈士的種種軼事傳說，包括弔祭的少女、名妓之墓、「卅六鴛鴦同命鳥」等，正體現了大眾對多情英雄的憧憬，而在南社與鴛鴦蝴蝶派

39 〈花花絮絮〉，《神州日報》6 版（1911 年 5 月 31 日）。

40 平襟亞：〈「鴛鴦蝴蝶派」命名的故事〉，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 年），頁 179-181。

41 明 • 周銓：〈英雄氣短說〉，朱劍心：《晚明小品選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頁 12-13：「情之所在，一往輒深；移以事君，事君忠；以交友，交友信；以處事，處事深。……凡所謂情，政非一節之稱也，通於人道之大，發端兒女之間。古未有不深於情，能大其英雄之氣者。……余故謂惟兒女情深，乃不為英雄氣短。」潘少瑜：《清末民初翻譯言情小說研究——以林紓與周瘦鵑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柯慶明先生指導，2008 年），頁 46-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詩文中，也往往呈現著「簫心劍氣」的浪漫情懷。[42]

黃花岡烈士的傳奇故事經過革命報刊的渲染和包裝之後，不但成為鼓吹革命的有力工具，也是一種題材聳動煽情的文化商品，如果暫時拋開它們原本的嚴肅目的不談，光就內容來看，結合了英雄熱血和兒女情長，正適合作為通俗小說的材料，而革命報刊所塑造的烈士形象，更對言情小說的寫作多所啟發。以下便將焦點放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林覺民身上，探討他的革命烈士形象及其建構過程，以及此類英雄傳奇與民初言情小說之間的關係。

（三）革命加戀愛：革命黨作為言情小說主角

林覺民首次出現在清末報刊上的時候，還是一位不知名的「剪辮西裝美少年」（當時〈與妻訣別書〉也尚未面世）；這位年輕人以其供詞之激烈痛快、行為舉止之文明有禮著稱。《香港華字日報》似為最先報導其事蹟者：

> 連日水提行臺所訊亂黨，口供不一而足，最激烈者，係前日在石井車站所獲之亂黨。該亂黨係閩籍人，剪辮西裝之美少年，據供年廿四歲，在黨內排至第六。是晚在花廳，約七點時候，先由委員問供，操福建語，傳供不甚了了，該亂黨改操英語，問各位懂否。說至此，黃廣協、吳參議、某洋務委員，均出廳問話，無何，李水提亦由樓上落廳與之問答。侃侃而談，暢論世界大勢，各國時事，了然胸中，隨即開去鐐扣命起（初坐地問供），給以位。李提、黃協、吳參議圍桌而問，是時廳外管帶、差弁、兵勇等環而聽之。李提給以筆墨，寫盡兩連白紙，不假思索，順筆而揮，擱筆三次，寫至激烈處，解衣磅礴，以手搥其胸，欲不忍寫。黃協用籠絡之術，以手拍其背者再，寫畢壹張，李提親手持上督院閱看。再寫第二張，寫畢稍為停頓，欲作咳吐狀，恐污地，不敢；李提命人持痰盂近前，始吐。某官命人給以茶、烟，起身行立正禮，迨將就刑，尚

42 參考龔鵬程：〈俠骨與柔情——論近代知識份子的生命型態〉，《近代思想史散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年），頁 110-1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如此從容。寫完供詞，在堂上演說，說至時局悲觀，搥胸頓足，力勸各官長，將來治下如此如此，切不可如此如此，「吾死猶生，雖千刀萬斬，亦所甘心！」[43]

林覺民在被捕後的種種舉動，包括口操英語、不隨地吐痰、行立正禮（一說為鞠躬禮）、[44]在堂上演說等等，都是當時中國人眼中「文明」的象徵；[45]而根據這篇報導，林覺民的「文明」行為，顯然也感染了「野蠻」的清朝官員。他們對他愛護有加，願意解開他的鐐銬，讓他坐在椅子上書寫供詞，不但在他咳嗽時「以手拍其背」，行事一向心狠手辣的提督李準竟然還命人持痰盂，供他使用（《時報》和《神州日報》甚至說李準「親持痰盂」）。黃世仲評論道：「中國官吏訊案之文明，則數百年來，當以此舉為絕無僅有矣！」[46]這場審訊可以說是「文明」的革命黨人感化「野蠻」的清政府的具體成果，也是林覺民對革命最突出的貢獻，為時人所津津樂道。

然而，林覺民事蹟的動人之處還不只這些。在事發兩個多月後，《民立報》確認了林覺民便是那位在官員面前侃侃而談的烈士，並對他的生平經歷和革命志業做了詳盡的敘述，而他的婚姻生活也成為報導的重點：

> 夫人亦賢，伉儷之篤，世罕其比，故君生平不二色，嘗謂人曰：「吾妻性情好尚，與余絕同，天真爛漫奇女子也。」近著〈原愛〉，論男女愛情之真理，載於某雜誌，見者莫不欽慕其風采。[47]

---

43 〈革黨第六侃侃而談〉，《香港華字日報》2 版（1911 年 5 月 4 日）。同樣的報導內容亦見於〈廣東革命黨案三誌‧訊辦革黨情形〉，《時報》3 版（1911 年 5 月 7 日）；又《神州日報》2 版（1911 年 5 月 9 日）。

44 包括稍後的〈革黨林覺民小史〉（《民立報》）、〈林覺民小史〉（《神州日報》3 版〔1911 年 7 月 23 日〕）皆持此說。

45 例如〈林覺民小史〉便特別強調其行為之「文明」：「寫將畢，稍為停頓，狀似將嘔，恐污地，未遽吐，以早受文明教育，性又嗜潔故也。李準親持痰盂近前，始吐。給以茶、烟，俱起鞠躬為禮（此乃文明儀節，報誤以為行立正禮）」。括號為原文所有。

46 黃世仲：《五日風聲》，頁 161。

47 同註 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黃花岡烈士中，像林覺民、陳意映夫妻這樣伉儷情深的為數不多，雖然此時〈與妻訣別書〉尚未公諸於世，但是這位「美少年」身為革命黨「情聖」的形象，已在逐漸醞釀。林覺民的婚姻雖為媒妁之言的結果，夫妻倆卻感情甚篤，從他撰寫〈原愛〉一文以「論男女愛情之真理」，便可看出他對於愛情議題必定別具會心，其觀點甚至有可能受到他嗜讀的俄國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作品的影響。[48] 林覺民生存於新舊交替的年代，他的婚姻結合了傳統的禮制和講求性靈相通的新式愛情，而他的〈與妻訣別書〉，也可說是轉型時期頗為重要的「情」論典範。

三二九之役發生之後，不但革命報刊競相大幅報導，騷人墨客歌詠不斷，[49] 文化界也致力於蒐羅軼聞，例如一笑生在事發一個多月之後，便編輯了《繪圖真像廣東近事革黨潮》，搜集各報新聞、哀悼文字，以及嘻笑怒罵的遊戲文章；《克復學報》彙集散見於上海各報的革命黨傳記，題為〈革命黨列傳〉；[50]《南越報》刊登了黃世仲的小說《五日風聲》；上海觀瀾閣書莊也隨即發行了傳奇小說《革黨亂粵記》：「將革黨鬧粵情形詳細演出」，並強調其「材料豐富，摹寫盡致，奇情異事，指不勝屈」；[51] 嶺南半翁的《辛亥粵亂匯編》，則蒐羅各報關於溫生才刺殺廣州將軍孚琦和三二九之役的報導……。[52] 在以上這些軼事小說中，林覺民經常做為重要人物出現。同時，三二九之役也成為戲劇的題

48 同註 16：「（林覺民）入慶應大學文科，專攻哲學，好讀露西亞文豪托爾斯泰書。」按：可惜〈原愛〉一文久已佚失，否則應該對於瞭解林覺民的愛情觀有極大的幫助。

49 例如棲雲和尚：〈憑吊革黨黃花塚詩〉，《香港華字日報》2 版（1911 年 6 月 15 日）；劍血生：〈過黃花岡七十二人墓有感而作〉，《民立報》第 6 頁（1911 年 11 月 11 日）等等。

50 《克復學報》所彙錄的黨人傳記包括趙聲、林文、林尹民、林覺民、陳與燊等。見〈革命黨列傳〉，《克復學報》2、3 期（1911 年）。

51 《革黨亂粵記》出版廣告，《民立報》第 1 頁（1911 年 6 月 1 日）。

52 見嶺南半翁：《辛亥粵亂匯編》，收入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 卷，頁 343、361-362。按：此書出版的時間甚早，多數烈士的姓名都尚未考察得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材，例如上海「歌舞臺」迅速推出了「廣東黨事新劇」《廣州血》（後因引起清廷和租界官員注意，改編為《南海潮》，又改為《時事新劇》，再變而為《新新茶花》）；[53] 而春柳劇場也不甘落於人後，在 1912 年上海「新新舞臺」的紀念黃花岡烈士大會上，搬演了新劇《黃花岡》。[54]

除了這些把歷史事件化為軼事小說和時事新劇的成果以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革命起義堂而皇之地進入了言情小說之中。由於革命報刊多把革命黨形容為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少年，且與年輕女性有著浪漫的關係，他們化身為言情小說的男主角亦屬順理成章，而他們可歌可泣的高貴情操，以及在戰場上流血廝殺的畫面，也成為時髦的主題與場景。民初小說中的革命黨和才子佳人小說中的男主角不同，他們不是追求金榜題名的書生，而是熟稔西學、富有革命理想的新時代青年，他們對於國家和愛人懷著熱烈的情感，並願意為此犧牲性命。他們的武器與其說是新式槍砲，不如說是「愛」——而這種融合國族意識和男女之情的「愛」，已經距離柳夢梅、賈寶玉等人的癡魔非常遙遠。近代小說中的革命黨愛情故事，多半是浪漫感傷的、善惡對立的通俗劇，其中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鴛蝴派祖師爺徐枕亞的《玉梨魂》（1912）。故事男主角何夢霞因為情場失意，決心一死報國，參加辛亥革命，卻不幸壯烈犧牲：

---

53 參考《廣州血》廣告，《時報》（1911 年 7 月 23 日）：「廣州黨事早已轟傳中外，言人人殊，莫得真相，本舞臺探訪各界，調查確實，其中情節大都未經報界批露者，今特請大文學家以警醒之詞句，典雅之曲文，編排《廣州血》新劇十大本，連臺接演，後續《黃花崗》，自趙聲統軍於江南起，至廣州黨人敗散為終劇，淋淚悲壯，動魄驚心，誠中國有史以來空前絕後之壯觀也」；《南海潮》廣告，《神州日報》4 版（1911 年 8 月 4 日）：「為中西官重視此劇（《廣州血》），本舞臺仰體憲意，特為停止，今已改編《南海潮》」；《時事新劇》廣告，《時報》（1911 年 8 月 16 日）；《新新茶花》廣告，《時報》（1911 年 8 月 18 日）。按：由廣告內容看來，《南海潮》、《時事新劇》和《新新茶花》三者指的應是同一齣戲，主事者可能因為清廷和法租界施壓，而不得不改弦更張。至於改名《新新茶花》，應是意圖藉當時上海「新舞臺」盛演的《新茶花》之名氣推銷。

54 癡萍：〈春柳始末記〉，周劍雲編：《菊部叢刊・歌臺新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4 年），頁 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越一年，義師起武漢間，海內外愛國青年雲集影從，以文弱書生荷槍挾彈、從容赴義者，不知凡幾。後有友人黃某自鄂歸，為余道戰時情狀。言是役也，革命軍雖勇氣百倍，而從軍者多自筆陣中來，棄三寸毛錐，代五響毛瑟，腕弱力微，槍法又不熟諳，徒憑一往直前之概，衝鋒陷陣，視死如歸，往往槍機未撥，而敵人之彈，已貫其腦而洞其胸矣。血肉狼藉，肢體縱橫，厥狀至慘。曾親見一人（按：即何夢霞），類留學生，面如冠玉，其力殆足縛雞，時已身中數彈，血濡盈褲，猶舉槍指敵，連發殪三人，然後擲槍倒地，身簌簌動。余遠在百碼以外，望之殊了了，中心震悼。[55]

徐枕亞對於愛國青年戰死沙場的情節描寫，顯然和前引革命黨小傳十分類似，何夢霞與黃花岡烈士都是俊秀文弱的書生（前者是「面如冠玉，其力殆足縛雞」，後者則是「貌如玉、腸如鐵」[56]），而且都具備驚人的意志力，在身受重傷之後仍能連殺多人。不過，徐枕亞還寫出了革命報刊所隱而不宣的愛國青年的弱點所在：他們缺乏軍事訓練，「腕弱力微，槍法又不熟諳」，因而「往往槍機未撥，而敵人之彈，已貫其腦而洞其胸矣。」弔詭的是，這樣的小說描寫，甚至比革命報刊的報導更令人信服。

除了《玉梨魂》之外，其他鴛蝴派小說也經常鋪敘此種「革命加戀愛」的主題。在周瘦鵑的短篇小說〈真假愛情〉（1914）中，辛亥革命猶如戀愛的試金石，唯有支持男主角參與革命的明理女性，才能和他共譜美滿姻緣，而男主角在戰場上援救情敵的英勇行為，也凸顯了無私「大我」理應戰勝自私「小我」的價值觀。[57] 又如李定夷的《茜窗淚影》，描寫愛國青年拋下未婚妻，參與革命軍的北征，為國捐軀，雖然字裏行間時時透露出古典文學「勞人思婦」主題

---

55 徐枕亞：《玉梨魂》，收入《中國近代珍稀本小說》（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 年），第 10 冊，頁 370-371。

56 〈林覺民小史〉，《神州日報》3 版（1911 年 7 月 23 日）。

57 周瘦鵑：〈真假愛情〉，《禮拜六》5 期（1914 年 7 月 4 日），頁 49-55；6 期（1914 年 7 月 11 日），頁 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影子，但是此處的「勞人」已經是懷抱國族意識的革命青年，而「思婦」更是富有行動力的堅毅女性，革命救國成為全書情節發展的推動力量。民初鴛蝴派作家多為支持革命的南社分子，或許這是他們對此類主題特別關注的原因之一。

如上所述，從革命報刊、軼聞彙錄、傳奇小說，到言情小說的一系列發展過程中，革命報刊所報導的烈士事蹟和對讀者大眾「動之以情」的宣傳策略，為革命黨的形象蒙上了濃厚的浪漫色彩。姑且不論革命報刊的報導有幾分真實性，它們的確達到了宣傳革命的效果，也連帶地刺激了近代作家的想像，並被吸納轉化為文學的資源。日後將要浮出歷史地表，與世人見面的〈與妻訣別書〉，所呈現的便是這樣一種「革命加戀愛」的文學主題。

三、浮出歷史地表：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摹印刊佈

（一）《廣州民國日報・黃花號》與民初的政治背景

隨著民國的建立，黃花岡烈士的紀念活動在各地大規模展開。紀念儀式改由國民黨的行政機關主持，參加「黃花節」[58]紀念遊行的黨員、官員、學生和民眾逐年增多，紀念烈士不再是廣東和南洋地區民眾自發性的弔祭活動，[59]而成為具有官方性質的集體動員。國民黨的機關報《廣州民國日報》，[60]於 1924

58 紀念黃花岡烈士的節日，原本稱為「黃花節」，於每年陰曆 3 月 29 日舉行紀念活動；1924 年 6 月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決議，改在陽曆 3 月 29 日舉行；1944 年，國民政府又將此紀念日改稱為「青年節」，沿用至今。

59 〈廣東亂後拾遺記（十三）・黃花志士之紀念塔〉，《神州日報》3 版（1911 年 7 月 2 日）；〈廣東光復後之鱗爪〉，《神州日報》2 版（1911 年 11 月 22 日）；〈公祭黃花岡烈士紀盛〉，《神州日報》4 版（1911 年 11 月 29 日）。

60 《廣州民國日報》由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於 1923 年創立，在 1924 年 9 月以前，它一直由廣東市黨部管理，其後才在孫中山的指示下，被移交給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參考（美）費約翰著，李恭忠、李里峰等譯：《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北京：三聯書店，2004 年），頁 4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的黃花節（陰曆 3 月 29 日，陽曆 5 月 2 日）推出「黃花號」紀念特刊，其內容重點在於考察黃花岡烈士之人數和身分，以還原歷史真相，同時緬懷死難烈士，向他們致上崇高的敬意，而其中的焦點人物，便是林覺民。「黃花號」不但完整刊出〈林烈士絕命書之一〉（即〈林覺民稟父絕筆書〉）[61] 和〈林覺民寄妻書〉（即〈與妻訣別書〉）的內容，還有原件的巨幅照片，以及林森的〈摹印林烈士絕命書誌〉，說明這兩封書信的來源和刊載的用意。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作於廣州三二九之役的前三天，並在他殉難後數日即由友人轉寄至家中，但這件事距離「黃花號」的出刊已有十三年之久，為何林覺民的嗣父林可山遲至此時才決定獻出此信，而且是交給林森？[62] 林森又為何在「黃花號」上將其公諸於世？這些問題的答案，必須從 1920 年代的歷史脈絡來追索。

長久以來，林森便和黃花岡紀念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由於黃花岡烈士中包括多位福建籍人士，身為同鄉的林森對他們懷著特別深厚的感情，並且他清楚地意識到，這些烈士對於維護國民黨的形象有著重要的意義。早在 1919 年，時任南京臨時參議院議長的林森，便因為在民初的紛亂政局下，「環顧國中，關於革命事蹟，除黃花岡一坏乾淨土外，無一紀念標誌，足以喚起國民觀感」，[63] 於是倡議在黃花岡原址建造「中華民國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紀功坊」，並積極向海外黨員募捐，將捐獻者之名鐫刻於石上。[64] 林森於 1922 年任福建省長，頗

61 此書全文僅四十餘字，內容如下：「不孝兒覺民叩稟 父親大人：兒死矣！惟我 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補於全國同胞也，大罪乞恕之！」見《廣州民國日報》1 版（1924 年 5 月 2 日）。

62 林森：〈摹印林烈士絕命書誌〉，《廣州民國日報》3 版（1924 年 5 月 2 日）：「今春承林烈士尊翁可山先生寄示林烈士絕命書兩件。」

63 林森：〈籌建締造中華民國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紀功坊捐啟〉，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前國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遺集》（臺北：前國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1966 年），頁 464。

64 林森：〈致雲高華國民黨總支部盼助籌建黃花岡烈士紀功坊函〉，出處同上，頁 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受民眾愛戴，在國民黨改組後，又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海外部部長，[65] 位高權重的他恰好也是 1924 年黃花岡公祭的籌備主任，[66] 因此林可山將林覺民的遺書託付給林森，可說是理所當然。林森得到福建閩侯縣 [67] 同鄉林覺民這兩封「慷慨悽愴，至情至性」的遺書，想必大喜過望，因為它們對於反擊國民黨的敵對勢力，具有重大的幫助。林森在〈摹印林烈士絕命書誌〉文中指出：

> 俗輩嘗詬革命主義為破壞，且目黨人為無賴，蓋事大者功遲，非如南畝耕獲，可以計日收効；而黨人成仁取義者，叱咤淋漓，不可一世之狀，又為彼輩所不覩耳，使其讀此，當何如也？ [68]

林森對這封信的運用手法，正與當年的《神州日報》和《民立報》記者相似，只不過他現在要對抗的不是滿清政府，而是各地的軍閥和反對國民黨的勢力。〈與妻訣別書〉所能發揮的宣傳功效，不下於任何鼓吹革命的文字，而信中純潔高尚的情操，更能大幅提升國民黨的形象，因此受到高度的重視。

回顧林覺民遺書「出土」的 1924 年，實是國民黨發展史上關鍵的年代。該年年初，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行全面改組，發表具體政綱；孫中山親自講述《三民主義》，提出「以黨建國」的原則，制定《建國大綱》，主張聯俄容共，[69] 並開辦黃埔軍官學校，建立革命武力，期勉將士們「踔厲奮發，掃除餘孽，整師北嚮，以為國民請命」。[70] 不僅如此，會中還決

---

65 〈林森〉，黃季陸主編：《革命人物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 年），第 2 集，頁 435。

66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公祭黃花崗先烈通告〉，《中國國民黨周刊》18 期（1924 年 4 月 27 日 8 版）。

67 在 1944 年林森逝世後，閩侯縣改名為林森縣。

68 同註 62。

69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4 年），第 2 編，頁 347-348；費約翰：《喚醒中國》，頁 278-279；呂芳上：〈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後的宣傳刊物〉，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 年），第 4 冊，頁 111-113。

70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致全國討賊將士函〉，《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漢口檔案》（1924 年 1 月 20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議建立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紀念碑，討論烈士遺族撫卹事宜。[71] 就國民黨的立場而言，照顧烈士遺族和未來革命的推動息息相關，若不善待遺族，將使黨員寒心，甚而影響北伐大業。這項提案和鄒魯的〈徵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事實〉啟事一併刊登在代表國民黨中央言論機關的《中國國民黨周刊》上，可見中央對黃花岡烈士的重視，而此事也為全體黨員所共知。[72] 或許林可山正是有鑑於黨中央的熱情徵召，以及林氏家族利益的考量，決定讓林覺民的訣別書與世人見面。〈與妻訣別書〉所具有的強大「感傷的力量」，不僅能為林覺民的遺族爭取到更多的同情和撫恤，對國民黨也有著重要的作用：它血淚斑斑的文字可以「激勵來者」，讓更多青年願意投身革命行列，亦能喚起國人對於三二九之役的記憶，凝聚士氣，促進北伐的成功。

若將 1924 年國民黨一全大會中黃花岡烈士遺族的撫恤議案、「黃花號」的出刊、林覺民遺書的發表、黃埔軍校的成立（孫中山在該年的黃花節任命蔣中正為校長）等事件連貫起來，不難看出其中的每個環節都經過精心的籌畫，其目的在於將「黃花岡」做為一種革命圖騰，運用在現實的政治軍事情勢上，使其發揮最大的邊際效益。至於「黃花號」裏的焦點文本〈與妻訣別書〉，正如林森預期中的，引發了社會上熱烈的迴響，[73] 成為激勵革命精神的最佳文

71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61、68-69；〈全國代表大會各種重要提議・請議撫恤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遺族〉，《中國國民黨周刊》10 期（1924 年 3 月 2 日 4 版）。

72 《中國國民黨周刊》的前身為《國民黨周刊》，二者皆為 1923-1924 年間國民黨改組時期重要的宣傳刊物，《國民黨周刊》前五期每期發行五萬份，分銷海內外，從第六期起改為三萬份，同時規定每位黨員必須購閱一份，每人均有代售之責，可見其傳播範圍之廣，所以這兩份刊物是此時期真正能代表中央喉舌，負起指導民眾、訓練黨員的重要刊物。見呂芳上：〈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後的宣傳刊物〉，頁 103、121。

73 例如邵力子在南京黃花崗紀念日的演講，便提到林覺民進攻廣州時「曾有一封信寫給他的愛妻」，「（信中）有云：……我們應本我們的互愛，推及全國青年男女的互愛，犧牲我們的幸福，去求全國青年男女的幸福」，所以「我們應本著林烈士的精神，犧牲我們自己的衣食住享受，為大多數人民自由求幸福來解放而革命。」見〈黃花崗革命與價值〉，《上海民國日報》4 版（1928 年 4 月 6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宣。從北伐、抗戰、剿匪，一直到國府遷臺，不計其數的讀者之所以被這封情書感動落淚，並矢志追隨林覺民的腳步，為國為民犧牲奉獻，其文中所蘊含之「感傷的力量」，厥功至偉。

（二）張天化《血花集》和〈與妻訣別書〉原件的下落

《廣州民國日報》的「黃花號」刊出後四年（1928 年），張天化[74]所編輯的《血花集》，由國民黨創辦的上海民智書局出版。[75]該書刊登黃興、吳樾、徐錫麟、秋瑾、方聲洞、林覺民等人之遺像，上編為《吳樾遺書》，收錄吳樾的〈暗殺時代〉、〈復妻書〉、〈與妻書〉等十四篇文章；下編則收錄〈徐錫麟供詞〉、〈秋瑾女俠遺詩〉、〈方聲洞家書〉、〈林覺民家書〉（兩封）[76]等文，並附諸先烈之傳略。張天化在序文中表示，這本書是「發揚民族精神的至寶」，他期待中國同胞們讀過此書之後，能夠「個個總熱血沸騰，丹心耿耿，鼓起精神，努力來救民救國，以竟諸先烈未竟之志，以盡吾人應盡之責」。[77]《血花集》所彙集的革命烈士文章和傳略，代表了最正統、最純潔的革命精神，而此書出版時，正值國民黨清黨之後，恢復黨權，建都南京，北伐也即將成功，是民國成立以來全黨士氣最為高昂的時刻，對於革命先烈精神遺產的重新整理、去蕪存菁，並將其貫徹於教育之中，推行全國，自是當務之急。日後中學國文課本裏所收錄的〈與妻訣別書〉，便是出自《血花集》，[78]而張天化改動原文的痕

74 張天化生平資料不詳，其編著作品除了《血花集》之外，還包括《文學與革命》（1928）、《赤俄遊記》（譯著，1928）、《蘇俄共產主義之崩潰》（1929）等，均由上海民智書局出版。

75 民智書局的創辦與財務狀況，可參考費約翰：《喚醒中國》，頁 290。

76 即〈稟父書〉和〈與妻訣別書〉。

77 張天化編：《血花集》，頁 1。

78 參見宋文翰編：《初級適用中華文選》（上海：中華書局，1947 年），第 4 冊，頁 131。按：後來還有許多其他版本的國文教科書，均註明〈與妻訣別書〉一文選自《血花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跡，也存留在歷屆教科書之中。[79]

然而，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雖代表最純潔高貴的革命精神，同時卻也象徵著一個後人永遠無法回歸的道德頂峰，因為早在滿清覆滅、民國建立之時，那種高貴的精神便已隨著黃花岡烈士而被掩埋，革命黨得勢之後所面臨的各種利益和權力的誘惑，讓許多人拋棄了當初的偉大理想。因此〈與妻訣別書〉也成為理想主義者批判政治局勢和社會現況的有力武器，例如 1930 年出版的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便抄錄此信全文，並發出沉痛的諍言：

> 此是革命黨員一篇至高尚純潔的情書，附錄於此，使讀者知道黃花崗烈士是為什麼流血犧牲的。假使後來的革命黨員，大家都守著這種高尚純白的精神，替國民謀幸福，民國當早抵於安康福樂的境地了，何至尚有今日的擾攘！乃一至滿清傾覆，而此種高尚純潔的黨員不易見，吾知林烈士當與諸烈痛哭于九原！[80]

在〈與妻訣別書〉公開發表後的數十年歲月裏，類似的感嘆屢見不鮮，每逢國家發生重大危機，便會有人想起這封信，感嘆革命先烈的枉然犧牲，並緬懷那難以重現的高尚純潔的年代。

至於〈與妻訣別書〉的原件——那條泛黃的白手帕，它被林覺民的遺族謹慎保管了四十多年，即使在顛沛流離的亂世之中，也未曾須臾或忘。到了 1959 年 5 月，林覺民之子林仲新才決定將它獻給中共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由福州的福建省博物館收藏，而自己則留下其複製品，此複製品後來傳給了林覺民之孫林天立。[81]1959 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週年，林仲新在此刻將傳家之寶的兩封遺書獻給中共當局，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就如同三十多

---

79 例如原文作「巾短情長」，《血花集》將其改為「紙短情長」，其後所有的國文教科書皆循此。

80 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 年），頁 172。

81 林天立：〈英傑正氣・永世長存——紀念祖父林覺民就義八十週年〉，《中央日報》17 版（1991 年 10 月 3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前林可山決定藉由國民黨高官之手將它們公諸於世，也並非出於偶然。〈與妻訣別書〉最初雖然只是一封私密的家信，但是它的生命歷程卻充滿了政治色彩，而它被開發出的各種教育功能，也絕非林覺民當年在「淚珠和筆墨齊下」之時所能預見。

四、革命言情正典：中學國文教科書裏的〈與妻訣別書〉

（一）當〈與妻訣別書〉成為教材

林覺民〈與妻訣別書〉面世之後不久，便受到教科書編者的青睞，進入中學課本。根據筆者的考察，這封信成為中學國文教科書中的一課，應不會晚於1929年。[82]該年出版的朱文叔編《初級中學用新中華國語與國文教科書》，[83]篇名為〈林烈士絕筆書〉，時間僅在《血花集》問世後一年，距離林森在報上公佈林覺民的家書也才不過五年。不久之後，中華書局出版的朱文叔編《初中國文讀本》（1933），又再度選了這封信，改名為〈與妻訣別書〉。此後，各大教科書出版商如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世界書局等，也都紛紛將〈與妻訣別書〉收錄到中學國文教材之中，包括傅東華編《復興初級中學教科書國文》（1934）、夏丏尊與葉紹鈞合編《初中國文教本》（1937）、蔣伯潛編《蔣氏初中新國文》（1937）等。

國民政府對課程內容和學校體系的強制領導與改革自1925年始於廣東省，其意圖在於透過國立學校體系來推行「黨化教育」，對各級學生盡量灌輸黨

82 目前筆者所能接觸到的民國時期國文教科書，皆為臺北國立編譯館教科書資料中心之館藏，遺珠之憾在所難免，日後自當盡力蒐求補齊。自1911到1949年之間出版的中學語文教科書目錄，可參考蔡世明：《近百年來我國中學國文教學的發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頁133-142。

83 本節所提及之各家教科書的詳細出版資料，請參見附錄，以下僅以括號註明部分教科書的初版年代，以利參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義，[84] 而在 1929 年頒布「新課標」以後，中學國文教科書的選文標準和課程目標更產生了巨大的變化，[85] 而那也正好是〈與妻訣別書〉進入國文課本之時。1930 年代以降，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主導了中學國文科的教育，課本中大量選錄黨國要人的文章、孫中山的傳記和遺著、蔣中正的言論、國民黨歷次重要宣言，以及革命先烈傳記等。[86] 愛國思想的鼓吹、民族意識的發揚，成為中學國文教學的重要目標，[87] 使得原本題材內容豐富多元的國文教科書，逐漸走向單調統一，而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入選與否，幾乎可以視為探測各家教科書政治立場的風向針。

要說明的是，國文教科書中所選的愛國文章通常不會只有〈與妻訣別書〉一篇，也會包括其他相關的作品，形成一個「革命烈士文學」或「國民黨文學」的群體，顯示出國民黨意識形態對中學國文教育的滲透。例如前述朱文叔編的《初級中學用新中華國語與國文教科書》，除了〈林烈士絕筆書〉以外，還收錄了胡適〈四烈士塚上的沒字碑歌〉、孫中山〈《黃花岡烈士事略》序一〉、[88] 胡漢民〈《黃花岡烈士事略》序二〉，以及天嘯 [89]〈林尹民傳〉等文章，而在

---

84 費約翰：《喚醒中國》，頁 391-393；陳進金：《抗戰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7 年），頁 116。按：「黨化教育」之名於 1928 年廢止，代之以「三民主義教育」。

85 關於中學課程標準編訂之經過，參見教育部：《修正初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上海：正中書局，1946 年），頁 1-3。

86 1940 年，國民政府下令取消教科書原本的「審定制」，而改行「部編制」。兩年後，部編中學《國文》（或稱「國定本」）問世，被指定為全國各中學統一用書，這套教材內容除了傳統選文之外，還收錄國民政府及其要員的文稿、講話等。參考蔡世明：《近百年來我國中學國文教學的發展》，頁 131；教育部：《修正初高級中學課程標準》，頁 17：「三民主義不應僅於黨義一科內教學，各科教學均應注意及之，尤其國文、史地等科應滲透三民主義。」頁 61：「（初級中學國文教科書）選文材料中，應注意加入左列各項文選：總理傳記及遺著。總裁言論。中國國民黨史略，及歷次重要宣言。中國國民革命史實。革命先烈傳記及遺著。黨國先進言論。」

87 同註 82，頁 73-74。

88 這是教科書裏最常伴隨〈與妻訣別書〉出現的文章。

89 這位「天嘯」乃是同盟會會員鄭烈，並非小說家徐天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書第一冊的〈編輯大意〉裏，便開宗明義地宣稱其選材標準之一為「合於中國國民黨黨義，能彀發揚民族精神，引起政治興味，啟示建設的途徑並促其努力者」，[90] 其政治傾向也就無可置疑了。又如朱文叔稍後編纂的《初中國文讀本》，選了汪兆銘的〈「和平」、「奮鬪」、「救中國」〉；傅東華編著的《復興初級中學教科書國文》，在第二冊放了因公的〈孫中山先生的幼年時代〉，第五冊則把佚名的〈林覺民傳〉和林覺民的〈絕筆書〉（即〈與妻訣別書〉）並列。在 1949 年之前，宋文翰所編的《初級適用中華文選》（1947），幾乎可說是最具國民黨色彩的國文課本，光是在它的第四冊裏，就有八篇洋溢忠黨愛國之情的文章。[91]

然而，對照同一位編者宋文翰在十年前所編的《新編初中國文》（1937）的選文標準，卻和他的《初中適用中華文選》截然不同——魯迅、巴金、老舍等左翼作家的作品皆雀屏中選，而沒有忠黨愛國的文章。再以另外兩種在 1930 年代初期出版的國文教科書為例，更可以看出選文標準的變遷：例如莊適編的《現代初中教科書國語》（1930），第二冊有梁啟超譯《十五小豪傑》、《天方夜譚》等書的選段，第四冊又有林紓譯《吟邊燕語．肉券》；[92] 戴叔清編的《初級中學國語教科書》（1933），[93] 內容包羅萬象，例如魯迅〈《吶喊》自序〉、郁達夫〈燈蛾埋葬之夜〉、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說，甚至歌德的《浮士德》提要，都在其中。這兩種教科書，都並未選錄〈與妻訣別書〉或〈《黃花岡烈士事略》序〉一類文字，反而大量採集了五四的新文學創作和翻譯作品，其中也包含不少左翼作家的文章。

90 朱文叔編：《初級中學用新中華國語與國文教科書》（上海：新國民圖書社出版，中華書局印行，1932 年），第 1 冊，頁 1。

91 即蔣中正〈祭總理文〉、蔡元培〈祭中山先生文〉、天嘯〈林尹民傳〉、林覺民〈與妻訣別書〉、吳樾〈復妻書〉，以及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真精神〉、〈建國大綱緒言〉，以及〈《黃花岡烈士事略》序〉。

92 莊適編：《現代初中教科書國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年初版、1932 年國難後 2 版），第 2、4 冊。

93 戴叔清編：《初級中學國語教科書》（上海：文藝書局，1933 年），第 4 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想而知的是，自從 1949 年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之後，左翼作家的作品便從國文教科書中銷聲匿跡，而〈與妻訣別書〉則屹立不搖，站穩了經典課文的地位。舉凡遷臺初期由高明編著的《初級中學國文》（1950）、孫云遐編的《初級中學國文》（1952），一直到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科編輯委員會編的各版《初級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以及 1968 到 1999 年間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印的國中國文教科書之中，莫不有林覺民和陳意映夫妻的儷影。在這五十年間，〈與妻訣別書〉都是臺灣地區中學生必須精讀甚至背誦的課文。

（二）教科書編者對〈與妻訣別書〉的修訂與賞析

將中學國文教科書裏所收錄的〈與妻訣別書〉版本與原文比較，不難發現其中幾段文字經常被教科書編者刪去，例如「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所以為汝體貼者惟恐未盡」，以及林覺民署名之後附加的「家中諸母皆通文，有不解處，望請其指教，當盡吾意為幸」等等。或許是因為這些段落的文字不夠雅馴，或過於累贅，缺乏教育意義，甚至暗示陳意映可能讀不懂這封信，所以在 1952 年以後，臺灣地區絕大多數的國文教科書都將它們刪除。又如原文中「徧地腥雲」一句，不知何故被改成了「徧地腥羶」；[94] 其次，林覺民原將寫作日期誤植為「辛未」，早期教科書對此曾特加解釋，[95] 但後來大概因為多數編者都覺得這是無關緊要的細節，便將「辛未」直接改正為「辛亥」了。[96]

---

94 例如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科編輯委員會編：《中學標準教科書初中國文》（南投：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9 年），第 5 冊；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國文科教科書》（臺北：國立編譯館，1971 年），第 4 冊。按：此後所有臺灣地區國文教科書版本均作「腥羶」。

95 例如陸鐵乘、李曰剛編：《華國高中國文》（臺北：華國出版社，1953 年），第 2 冊，頁 289 注釋 15：「辛未，為辛亥之筆誤，可見作者草此書時之心亂如蘇也。」

96 例如章銳初編：《啟明初級中學教科書國文》（臺北：臺灣啟明書局，1954 年），第 4 冊，頁 100。按：其後國立編譯館編印的所有收錄〈與妻訣別書〉的國中國文教科書版本亦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顯然，〈與妻訣別書〉雖被認定為革命先烈的偉大作品，它在藝術技巧和行文上仍有瑕疵，所以必須要經過刪改之後，才適於中學生閱讀。

除了上述問題以外，從某些教科書編者對課文的分析解讀來看，他們對林覺民文白夾雜的文體也不太滿意。例如《光華本初中國文教科書》的「本篇分析」：

> 本文為一家書，且於必死國事之前夕致情誼頗篤之愛妻者，以充滿至情實感，故雖不遑為文，而文自佳妙。文言中雜用一二俗語（如「到那時」及「眼睜睜」等），亦不足以為疵。有至性方有至文，誠然。[97]

又如《啟明初級中學教科書國文》的「篇題簡釋」：

> 所用詞彙語句，皆係現代組織方式，初學文言文寫作，最好以此種文辭為範。就中偶亦間雜一、二語體詞語，均極自然，尤其在普通書札不以為病；但學之者尚宜免避，以免畫虎不成。[98]

因此，在課後的「應用練習」中，便出現了這樣的題目：

> 試將左列語錄式的四語，略加改易，使各成為純粹的文言。
>
> 「幾家能夠」。
>
> 「國事成不成」。
>
> 「女必像汝」。
>
> 「到那時，使我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99]

上面的例子讓人感覺到，這幾位教科書編者對於〈與妻訣別書〉被列為必須精讀背誦的課文這件事，似乎有些不情願，因此他們在讚美之中夾雜著委婉的批評，間接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編者們一方面推崇此文十分「佳妙」，另一方面，

---

97 臧啟芳、李雄等編著：《光華本初中國文教科書》（臺北：反攻出版社，1953 年），第 5 冊，頁 19。

98 同註 96，頁 101。

99 同註 96，頁 103。在年代稍晚的國文教科書中，也出現過同樣的習題，例如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科編輯委員會編：《初級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南投：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5 年），第 5 冊，頁 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卻也點出作者的「不遑為文」；[100] 他們表面上說林覺民在信中使用俗語的做法「不足以為疵」，但這卻反過來證明了他們認為文體的混雜的確是一種毛病，更糟的是，學生還可能會「畫虎不成反類犬」，故而應該練習如何把信中「語錄式」的句子改成「純粹的文言」。

更為關鍵的是，從教育的觀點來看，〈與妻訣別書〉的內容難免讓人有些尷尬，因為這封「兒女與英雄並見」[101] 的書信固然能勾起許多人的愛國熱淚，但是它卻也有可能在青春期學子之中引發曖昧的笑聲，甚至成為情竇初開的學生們寫作情書的某種範本。〈與妻訣別書〉原本是一封寫給愛妻的私信，其中自然有許多抒情的段落，但是「意映卿卿如晤」和諸多情語背後所指涉的崇高精神，學生們未必能體會，他們從這封信中讀到的，反而可能是卿卿我我的男女關係，因此編者勢必要對課文做一些改動。例如原文有一段對於營造抒情感傷氣氛相當重要的描寫，便曾經長期「失踪」：

> 迴憶后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屋，為吾與汝雙棲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餘淚痕。

在林覺民的心裏，和妻子於月下並肩攜手的場景，凝聚了這段愛情最美好的回憶，但它卻可能會使學生聯想起言情文學中的男女幽會，而造成他們的心情浮動。據此標準，下面這一段話也是「青少年不宜」的，應該省略：

> 即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重圓？則較死為苦也，將奈之何！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之不

100 王夢鷗也認為此文的語句多所重複，但情有可原。見王夢鷗編：《華僑初級中學國文》（臺北：正中書局，1955 年），第 6 冊，頁 41「作法」：「本篇是非常之人在非常的心理狀態下寫給妻子的訣別書，目的在於慰解別人。……第七段，因上文引起的哀感，所以至此心緒很亂，寫了許多與上文重複的語句，雖然重複，但是反而顯見其對妻子的關心而再四叮嚀。」

101 同註 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102]

林覺民描寫夫妻相思之苦和期待重逢的心情，情真意切，但是教科書編者自然不希望學生以「想入非非」的心態來閱讀這封信，在刪修之間如何拿捏尺度，指導學生「正確」的解讀方向，使一篇意在鼓舞愛國情操的革命正典不至於反過來誘發青年學子的思春情懷，可說是煞費苦心。或許是因為這類顧慮，所以在 1975 年之前的所有國文教科書，幾乎都把前引兩段文字刪除，[103] 到了 1975 年國立編譯館的版本，才讓它們恢復舊觀，之後一直到 1999 年，都沒有再更動。這樣的變化，表示隨著社會風氣的開放，教科書編者對男女之情的描述的尺度放寬了，教育當局的思考角度也改變了——畢竟和 1970 年代臺灣流行的瓊瑤小說比起來，〈與妻訣別書〉的情語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事實上，先前被教科書編者刪除的兩段話在原文的架構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要強調林覺民革命精神的偉大，那麼就必須凸顯他對妻子的情愛之深摯，無論他所使用的文字是否嚴謹雅潔、是否符合文言文的規範，是否使用「現代組織方式」的詞彙語句、夾雜口語（如「眼睜睜」）和翻譯名詞（如「心電感應」），甚至俚俗得像是言情小說的陳腔濫調（如典出王實甫《西廂記》的「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都必須如實照錄，方能呈顯其「不遑為文」的真摯之心。然而，在 1970 年代之前的教科書編者卻無暇兼顧這一層，思想的純正性才是他們最關切的重點。弔詭的是，教育當局處心積慮地利用〈與妻訣別書〉的「感傷的力量」來激發學生的愛國情操，卻往往導致意料之外的結果。信裏的革命意識與抒情話語孰輕孰重，在老師們和學生們的心裏恐怕有著截然不同的答案：學生從這封情書中所學習到的，究竟是民族大愛還是男女之情？它在學生心目中留下的印象，究竟在於林覺民為革命的犧牲奉獻、他對妻子的

102 有意思的是，這段被教科書刪除的文字，偏偏是鴛蝴派文人鄭逸梅最欣賞的「血淚語」，見鄭逸梅：《尺牘叢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頁 100。

103 少數的例外是王夢鷗編的《華僑初級中學國文》第 6 冊，以及陸鐵乘、李曰剛編的《華國高中國文》第 2 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愛戀深情，還是課堂上私語竊笑的尷尬氣氛？當時移事往，革命熱血已冷，林覺民和〈與妻訣別書〉對大眾的意義又剩下什麼？

（三）從愛國教育到情感教育：〈與妻訣別書〉的功能

要了解〈與妻訣別書〉在各版國文教科書中所擔負的教育功能，最直接的辦法，便是閱讀編者在課後所附的「題解」或是隨課本印行的「教師手冊」。多數編者的構想，是要利用這篇文情並茂的遺書，來激發學生們犧牲奉獻的愛國心，以振興國家民族，至於實際上該如何借題發揮，則要視當時的政治社會情況而定。例如國府遷臺初期，便曾有編者在〈與妻訣別書〉的課文後，附上一大篇義正詞嚴的文字，說明「死有重如泰山，有輕於鴻毛」的道理：

> 如林覺民之死，激起無數後繼者之同情與敵愾，終於推翻滿清專制，創建中華民國，使我五千年悠久之歷史文化得以綿延不絕。是其死為得當之死，死有重於泰山者矣。反觀今日當死不死之貪生蟲，如彼投匪之將領，受國家多年培植拔擢倚寄之深恩，若能明大義，以必死之決心，人人堅守防地，效死不去，盡忠報國，則一千二百萬方里之大好河山，何至拱手讓人？四億五千萬人口之炎黃子孫，何至關進鐵幕？即其自身亦何至認賊作父，裂節敗名，終不免於共匪之清算凌辱而致非命，此正所謂「貪生不生，怕死必死」者也。[104]

這樣凌厲肅殺的論述，是反共抗俄思想教育的體現，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之下，林覺民成了一位深明大義，抱有必死決心的青年代表。正如《血花集》中的林覺民遺書能用來激勵北伐將士，1950 年代的〈與妻訣別書〉課文也不妨用於宣傳反共復國。

隨著海峽兩岸情勢的趨緩，編者們所預設的〈與妻訣別書〉的教育功能，逐漸由敵我意識分明的愛國教育、民族精神教育，轉向了主體的情感和品格教育。例如 1987 年的《國民中學國文教師手冊》，便指導教師該如何從情感的

[104] 同註 95，頁 2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角度來切入這篇文章：

> 愛，本是人類共具的天性。但是，只有深於情的人，才能表現愛的真誠；只有達於理的人，才能表現愛的偉大。林覺民烈士可以說是既深於情又達於理的人了。他能真誠地去愛他的家人，並且又能把這種真誠的愛善加擴充，去愛全國全天下的人。……〈與妻訣別書〉，是林烈士滿腔情愛的自然流露；是一個偉大靈魂的自我表白。在這裏，不但洋溢著至情；而且還指點出至理。所以它能觸動每一個人的心弦，令人唏噓嘆惋，黯然淚下；也可以感奮每一個人的心志，使其了悟愛的真諦，知所自立。[105]

在此，林覺民個人的品格與情感世界，以及其文所引發的同情共感被視為重點，〈與妻訣別書〉成了「一個偉大靈魂的自我表白」，能讓人「了悟愛的真諦」，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只是一篇能夠拿來為某種政治或軍事目的服務的革命正典。換句話說，教科書對於〈與妻訣別書〉的「感傷的力量」的應用，已經由國族政治使命導向，逐漸轉為共通的人性關懷。

到了 1992 年的《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編者要學生學習的重點，進一步變成了歷史的想像力以及對文字的感受力；他們不再試圖引導學生去學習林覺民的愛國精神，且將之應用在當代的情境中，而轉為要求學生把林覺民放回他所屬的清末歷史脈絡，並設身處地了解他的內心世界。換句話說，同情和想像力的重要性，取代了愛國情操。林覺民的革命激情，在安定繁榮的工商業社會中似乎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因此編者將其簡化為一種不願「獨善其身」的倫理價值。從課後的「問題與討論」單元，可以看出編者的關注焦點：

> 一：請你根據這封信，想像作者所處的是怎麼樣的一個時代，和同學互相討論。
>
> 二：試根據這封書信，對作者的性情、人格作一番描述。
>
> 三：這封書信，最使你感動的是那些句子？它們為什麼會使你感動？

[105] 國立編譯館編：《國民中學國中國文教師手冊》（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 年），第 6 冊，頁 186-1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你認為做人該不該「獨善其身」？詳細地說出你的看法和理由。[106]

這些問題裏的關鍵詞「想像」和「感動」，或許是當代中學生面對歷史文獻時最缺乏的能力。諷刺的是，此版本的課文附有兩幅精美插圖，圖中的林覺民均作傳統清人打扮，身穿長衫、腦後留辮，[107] 反映了插畫家一廂情願的歷史想像，明顯與清末文獻記載的「剪辮西裝美少年」不符，正好做了錯誤的「想像」示範。對照林覺民在清末革命報刊上的文明前衛形象，以及他在八十年後的國文教科書中的傳統刻板造形，教科書對於過往歷史種種「想當然爾」的推測和詮釋，反而造成了學生理解複雜多變的清末世局的重大障礙。

臺灣地區最後一本收錄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國中國文教科書，由國立編譯館於 1999 年出版。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政黨輪替，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開放教科書市場，國立編譯館和民間各出版社所印行的各種國文教科書，不約而同地遺棄了這封曾經點燃無數青年學子愛國熱情的訣別信。雖然部分社會人士呼籲教科書業者將〈與妻訣別書〉重新收入課本之中，「以喚醒今日對人不感恩的學子愛的靈魂」，[108] 但恐怕是無濟於事的。〈與妻訣別書〉突兀的退場，象徵著時代的改變，國民黨的黨國意識形態不再主導國文科的教學，在新的世紀裏，臺灣中學生的國文課程，已經不是大張旗鼓的忠黨愛國教育，而七十二烈士所代表的黃花岡精神，也隨之成為明日黃花。[109]

---

106 國立編譯館編：《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臺北：國立編譯館，1992 年改編本初版），第 6 冊，頁 65。按：在後來國立編譯館所編的各版《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中，這四題都未曾更動。

107 同前註，頁 61、62。

108 黃慶祥：〈看〈背影〉也為〈與妻訣別書〉請命〉，《聯合報》A15 版（2003 年 9 月 15 日）。此文刊出之次日，一位補教老師也投書表示贊同，認為〈與妻訣別書〉之所以被刪，是意識形態作祟的結果，在現今「虛情假意的世界」，希望教科書可以再選入此文，「以喚起學子對國家之愛，與對至親之愛」。江信良：〈與妻訣別書有國家愛至親愛〉，《聯合報》A15 版（2003 年 9 月 16 日）。

109 可參考〈不教了！感人〈與妻訣別書〉，國中生無感〉，《聯合報》A12 版（2012 年 1 月 4 日）：「民國七十六年解嚴後，教科書中的黨政軍色彩逐漸淡化，加上多年來不少國中國文老師反映，這篇文章中談到夫妻之間的感情，國中生並無法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歷屆教科書編者對〈與妻訣別書〉的賞析和刪改之中，可以發現文言文教學的標準逐漸降低，語體詞語的摻雜不再被視為必須糾正的疵病，同時這封信的私情成分日益受到重視，對於夫妻之愛的描寫段落因而得以「重現江湖」，並且成為輔助人格情感教育的工具。這種轉變反映了政治社會和教育方針的變遷，藉由〈與妻訣別書〉的「感傷的力量」所喚起的同情共感，指涉的不再是國家民族意識，而是身為一個人所應該具備的純潔高貴的愛，這種愛理應超越國族政治、超越時空——無論如何，〈與妻訣別書〉終歸是一封情書。

（四）愛與死的通俗劇：重讀〈與妻訣別書〉

早在林森的〈摹印林烈士絕命書誌〉中，已經提出對〈與妻訣別書〉的標準解讀角度：「烈士以愛天下人之故，犧牲其一身與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愛，融小我於大我，擴小愛為大愛，惟烈士能用愛，亦惟烈士能用情。」[110] 後來的國文教科書皆沿用此種角度，使得多數學者在分析〈與妻訣別書〉時，存著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這是一封表達「對妻子的摯愛和對革命事業的忠誠」的信。[111] 然而，如果能暫時除去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客觀地重讀這封家書，將會驚訝地發現信中從頭到尾根本沒有出現「革命」二字——事實上，林覺民所談的只是「愛」與「死」兩件事。一封被政黨和教育當局用來激勵革命情操的信，竟然完全沒提到「革命」，這顯示意識形態對閱讀行為的影響之鉅，甚至能使讀者在閱讀時自動帶入某些觀念，而渾然不覺其中之誤差。林覺民身為革命黨員是不爭的事實，但是這封信的收信人陳意映並不知情。對一個不了解丈夫革命

會，編輯委員同意刪掉這篇。董金裕指出，文中談到的慷慨就義，現在的年輕人也很難體會。近年來有民眾陸續投書對這篇文章不再是國中國文內容表示惋惜，但投書的人都是成年人，成年人了解這種感情和意義，對國中生來說並非如此，『最好的不一定最適合。』」

110 同註 62。

111 趙景雲：〈英雄本色兒女情長——林覺民〈與妻書〉賞析〉，頁 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志業的妻子而言，這封家書所談的究竟是什麼？為了真正掌握〈與妻訣別書〉的內涵，我們有必要擺脫過去的政治性解讀方式，重新閱讀這封信，並將它視為一個文學文本，放入近代文學史的脈絡裏加以考察。

〈與妻訣別書〉共一千二百餘字，可分為八段，[112]「愛」與「死」是其中糾纏交織的主題，夫妻之間的彼此體恤，更是關鍵。信的開頭以「意映卿卿」的親暱稱謂，勾起夫妻之愛的聯繫，接著立即帶入死亡的陰影，設定全文基調：「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林覺民料想自己絕無生還之理，因此把最陰暗的結局擺在信的最前面。他深覺難以向妻子解釋自己必死的理由，「不能竟書，而欲擱筆」，但是再三猶豫之後，終於決定「忍悲為汝言之」。不過，林覺民是否在信中清楚交代了他決定犧牲生命的原因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與妻訣別書〉是一封充滿矛盾和情感衝突的信，第二段的開頭即為一悖論，辯證「愛」與「死」的關係：「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從陳意映的角度看來，若是丈夫愛她，便應該排除萬難，與她長相廝守；但是對林覺民而言，愛的極致乃是放下私人情感，勇敢迎向死亡，以幫助天下人得到幸福。林覺民引用《孟子 • 梁惠王》之語來解釋自己的理念：

> 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

112 此處按照國立編譯館的版本，將〈與妻訣別書〉全文分為八段：一、從「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到「故遂忍悲為汝言之」；二、從「吾至愛汝」到「汝其勿悲」；三、從「汝憶否」到「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四、從「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到「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五、從「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到「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六、從「吾今死無餘憾」到「甚幸！甚幸！」；七、從「吾家日後當甚貧」到「汝不必以無侶悲」；八、從「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到「其時時於夢中尋我乎！一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林覺民以「愛」替換儒家的「仁」論內容，運用「推己及人」的道德邏輯，使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變成了「愛吾愛以及人之愛」。他意欲「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此「充」字出自《孟子・公孫丑》，原指仁義禮智之「四端」（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須往外推擴，以平治天下；此處則是將其個人性的「愛」往外推擴，以便「為天下人謀永福」。不過林覺民並未細說其實踐的步驟，也並未解釋為何犧牲自己的生命便可造福天下人，他的目的只是要妻子體恤他的心情，走出自己狹隘的世界，以蒼生為念。

以體恤對方的心情為貫串線索，林覺民採用接二連三的倒敘，刻畫夫妻之間私密的情感，使人想起沈復的《浮生六記》；但是在林覺民筆下，除了夫妻兩人初婚時「何事不語、何情不訴」的甜蜜往事之外，其他的每一段回憶背後，都隱藏著欲言又止的秘密和惘惘的威脅。包括四、五年前夫妻倆關於「誰先死比較好」的對話；六、七年前他逃家復歸時，在妻子淚眼要求下（「望今後有遠行，必以告妾，妾願隨君行」）所做的承諾；以及他赴義前難以啟齒的內心掙扎、「日日呼酒買醉」的悲傷……，這些事件後面都潛伏著一股龐大的黑暗勢力，企圖將他們二人硬生生分開。林覺民說：

> 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汙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重圓？則較死為苦也，將奈之何！

林覺民認為活在當時的中國，除了死，別無其他出路，因為有天災、盜賊、列強瓜分、奸官汙吏的威脅，「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這股死亡勢力是躲不過的。就算一時不死，兩人若無法長相聚首，亦將生不如死。後文所謂「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感嘆當今千瘡百孔的中國容不下個人的幸福，何況他是一個情感豐沛的人，無法苟安於自己的美滿婚姻，而對百姓的痛苦視而不見。林覺民的推論是：既然將來只有死路一條，那麼何不善加利用，讓自己死得更有價值？他以通俗劇式的善惡對立的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言描述各種可能的悲慘狀況，來說服不明白革命意義的妻子。平心而論，儘管林覺民在〈與妻訣別書〉中以悲劇英雄的形象出現，但是他對夫妻相處情景的描繪，以及對未來命運的猜測，都帶有濃厚的感傷幻想色彩，他所編織的悲歡離合故事，以及善良的個人被無孔不入的邪惡勢力所殘害的情節，均具備通俗劇的特質，而信中採用的言情文學典故（「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眼成穿而骨化石」、「古來幾曾見破鏡重圓」），也展現了他對夫妻情愛的浪漫化想像。

林覺民將未來的盼望寄託在革命同志和家人身上，他把撫養兒女的任務交託給妻子（「汝其善撫之，使之肖我」、「教其以父志為志」），其意或許是為她找到活下去的理由，這也是他體恤妻子的一種表現。此外，他又用民間對靈界的觀念與外國科學新知的證據（「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來安慰妻子，希望她不要因為失去伴侶而過度悲痛，可謂體貼備至。林覺民從未向妻子透露過他的志業，為此他深感不安：

> 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然語之又恐汝日日為吾担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担憂，的的非吾所思。吾愛汝至，所以為汝體貼者惟恐未盡。

這段話顯示林覺民不僅是勇於赴死的英雄，更是細心體貼的丈夫，可惜臺灣的教科書編者卻把這一段刪節到只剩下「吾愛汝至」四個字，使文章大為減色。也許編者們認為林覺民對妻子的體貼不過是一種婦人之仁，會削弱他身為革命先烈的大無畏形象，殊不知這才是〈與妻訣別書〉真正動人之處。林覺民臨死之際仍盡力體恤自己的妻子，這樣深情款款的訣別書和吳樾所寫的措詞嚴峻、雄辯滔滔的〈復妻書〉和〈與妻書〉[113] 比較起來，何者對大眾讀者更具吸引力與說服力，不言可喻。

〈與妻訣別書〉乃是一封以深情取勝的信，文中多為情語，就連說理的部分也滲透了濃厚的情感，所以不時出現自我矛盾和悖論。林覺民雖然反覆論述

[113] 見張天化編：《血花集》，頁 20-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愛」的真諦和「死」的必然性，表明自己是為了替天下人謀福利而必須赴死，但是卻從未清楚說明箇中緣由（到底是為革命、為國家、還是為民族？）[114] 當然，為了怕牽連家人，林覺民不可能向妻子透露廣州起義的細節，但那些他刻意留下的空白，卻讓有心人能夠以意識形態話語去填補，使這封信「以情說理」的模式成為一種方便的框架，適用於實際的政治操作。

〈與妻訣別書〉對於夫妻命運的通俗劇式的鋪陳和真情流露的文字是其「感傷的力量」的來源，林覺民時而低迴宛轉、時而慷慨激昂的筆調，增強了論述的說服力。蘇雪林敏銳地指出，〈與妻訣別書〉的筆調逼肖林紓的翻譯小說，[115] 這可能是因為林譯小說的主角往往以感傷而激越的文字來傾訴心中情感，例如《巴黎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紅礁畫槳錄》等，都包含了纏綿悱惻的情書，和〈與妻訣別書〉有著微妙的相似性，其中尤以日本作家德富蘆花的暢銷小說《不如歸》（1898 年出版，1908 年林紓與魏易中譯）最為貼近。故事男主角在家庭生變之後，憤而請纓，以國族的神聖使命代替個人的情感關懷，使得殉國成為一種昇華的「殉情」，[116] 而他在軍中寫給妻子的情書，也表現出細膩動人的夫妻之愛。對照來看，〈與妻訣別書〉的寫作背景，以及林覺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都與《不如歸》有著足堪玩味的共鳴。[117]

林覺民〈與妻訣別書〉體現了革命先烈的夫妻之愛，且為人盡皆知的革命正典，若要探討 1920 年代風行的「革命加戀愛」的文學主題，或是近現代言情話語的複雜面向，這封信實為不可忽視的關鍵文本。〈與妻訣別書〉挪用了

114 相較之下，方聲洞赴義前寫給父親的家書便清楚剖析了反滿革命的必要，也表達了「覆巢之下無完卵」之意。同註 77，頁 54-56。

115 蘇雪林：〈林琴南先生〉，朱傳譽主編：《林琴南傳記資料》（臺北：天一出版社，1981 年），第 3 冊，頁 8。

116 潘少瑜：〈國恥癡情兩淒絕：林譯小說不如歸的國難論述與情感想像〉，《編譯論叢》5 卷 1 期（2012 年 3 月），頁 113-114。

117 目前雖未有明確資料顯示林覺民讀過《不如歸》或受其影響，不過考慮到這部小說在日本的暢銷、以及林紓譯本在中國受歡迎的程度，身為留日學生，又是林紓同鄉的林覺民，非常可能曾經接觸此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儒家傳統的文化資源，將清末民初對「兒女英雄」的想像加以轉化昇華、具體實踐，在論述「愛」與「死」的理念之餘，更有著通俗劇式的情節，以及纏綿感傷的筆調，因此能夠觸動人心，日後又經由政黨的意識形態教育和中學教科書的傳播，將其「感傷的力量」發揮到極致，遂成為大眾集體記憶中不可抹滅的一部分。

五、結語：林覺民和〈與妻訣別書〉的來生

打從一開始，廣州三二九之役就是相當引人矚目的文學藝術題材，而在林森公開刊印〈與妻訣別書〉、張天化出版《血花集》之後，林覺民更成為黃花岡烈士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此後數十年間，報刊上不但經常出現歌詠林覺民偉大情操的新舊詩篇和抒情散文，而與黃花岡相關的影劇作品，更紛紛以他為主角，演繹他和妻子之間的深情，以及為了革命而必須拋妻棄子的椎心之痛。例如田漢的劇本《黃花崗》（1925），主角即為林覺民，劇中對其外貌儀態的描述，顯然襲自革命報刊；[118] 而在 1928 年的新版中，他又根據後來才得見的〈與妻訣別書〉，加入了更多對夫妻之情的刻畫。[119] 在 1930 到 40 年代之間，至少還有五齣話劇或戲曲以林覺民為主要角色，並著重描述他和妻子生離死別之痛，[120] 其中尤以唐紹華於 1934 年編寫的話劇《黨人魂》（後改名《碧血黃

[118] 田漢：〈黃花崗〉，《大公報（長沙版）》副刊（1925 年 5 月 28 日）：「覺民一意緒瀟灑之美少年，目灼爍如流星，著學生服。雖不事邊幅而雄姿煥發，氣象儼然。」

[119] 田漢：〈黃花崗〉（長篇革命史劇），《中央日報》第 3 張第 4 面（1928 年 2 月 4 日）。

[120] 包括中大實小師生合作的《黃花崗》（1931）；李羅夢、盧野馬：《黃花崗（三月二十九日）》（1931）；廣東戲劇協會同人集體創作，胡春冰整理編輯：《黃花崗》（1939）；朱雙雲：《碧血黃花》（1940）；唐紹華：《黨人魂》（1934）等。以上資料根據董健主編：《中國現代戲劇總目提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花》）最受歡迎，曾在臺灣多次公演。[121] 此外，臺灣的福州同鄉會曾搬演林佛生的話劇《碧血黃花》，敘述林覺民的故事；[122] 而在雙十國慶晚會中，「意映卿卿」也曾經是畫龍點睛的一幕。[123] 在電影方面，1954 年的香港電影《碧血黃花》（卜萬蒼、張善琨等導演）和 1980 年的臺灣電影《碧血黃花》（丁善璽導演），皆以林覺民為主角，〈與妻訣別書〉所刻畫的「大時代兒女」愛情悲劇，儼然成為最佳的創作題材。

在臺灣工商業社會急速發展的 1980 年代，〈與妻訣別書〉引發了大眾對於那份未曾被商業利益和個人主義污染的「愛」的鄉愁，並融入流行文化，成為校園民歌、電影和電視連續劇的熱門主題。從 1960 到 80 年代晚期，臺灣有多部連續劇和至少三首流行歌曲是根據林覺民的生平事蹟和〈與妻訣別書〉寫成；[124] 舞蹈家林懷民亦曾編一舞，名為〈意映卿卿〉。[125] 這批成長於戰後的臺灣青壯輩創作者，他們少年時代的集體記憶在經過時間的醞釀發酵之後，結晶為琳瑯滿目的文化商品，催化著大眾的懷舊情緒。其後爲了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海峽兩岸所推出的話劇《與妻書》、電影《百年情書》（金舸導演）、閩

121 小民：〈《碧血黃花》觀後〉，《聯合報》6 版（1952 年 4 月 2 日）；哈公：〈評《碧血黃花》〉，《聯合報》6 版（1957 年 3 月 17 日）；〈大專院校同學慶祝青年節，演《碧血黃花》〉，《聯合報》6 版（1963 年 3 月 29 日）。

122 此劇分十三場進行，分別為暢論時政、惡少嬉春、酒樓徵艷、南歸赴義、國爾忘家、羊城完酒、祝壽聞警、戴月披星、議攻督署、前仆後繼、督衙夜審、碧血千秋等。參見〈福州戲《碧血黃花》定下月三日公演〉，《聯合報》9 版（1979 年 11 月 27 日）。

123 參見《聯合報》3 版（1978 年 10 月 11 日）的報導：「國慶晚會，昨天晚間在臺北市中華體育館盛大舉行，……三電視台演藝人員演出『締造民國』，……中視由吳風、李芷麟分別飾演林覺民，林妻——意映；林覺民視死如歸，意映捧訣別信肝腸寸斷，輕柔的男聲重複低喚『意映卿卿』！」

124 電視連續劇包括 1963 年臺視的《碧血黃花》、1974 年臺視的《旗正飄飄》、1981 年臺視的《丹心照汗青》和華視的《碧血黃花》（二者同樣選在青年節放映，且皆以林覺民故事為主軸），以及 1989 年臺灣華視製播的「政策戲」《六壯士・與妻訣別書——林覺民》。又，相關流行歌曲的作詞者和曲名分別是許乃勝〈意映卿卿〉、齊豫〈覺——遙寄林覺民〉，以及童安格〈訣別〉。

125 周玉山：〈想起林覺民〉，《聯合報》41 版（1998 年 3 月 29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劇《別妻書》、音樂劇《夢想家》等，也不約而同地將林覺民當作焦點人物。兩岸三地數十年間的相關藝術創作，可謂不絕如縷，這顯示〈與妻訣別書〉是多麼深入人心，為創作者提供了多少靈感，又開啟了多麼寬闊的想像空間。時至今日，林覺民仍是黃花岡烈士中形象最為鮮明的一位，這絕對是拜〈與妻訣別書〉之賜。

林覺民從清末革命報刊中不知名的「剪辮西裝美少年」，成為國民政府所公開追悼的革命先烈，他和革命同志們的文明開化形象，以及「兒女英雄」的浪漫情懷，也為民初的言情小說提供了靈感。林覺民的一生，最後被總結為一封〈與妻訣別書〉，經由政治宣傳和黨國教育體制的推動，他的個人形象遂與這封信緊密地連繫起來。綜觀〈與妻訣別書〉漫長而強韌的生命歷程，可以看到媒體與國家機器如何利用一篇私人文本內蘊的「感傷的力量」，藉由各式出版物，使它在各個時期發揮多樣化的影響：林覺民寫給妻子的訣別信，原本是家人之間的私密信件，卻在林可山和林森的政治考量之下被公諸於世；《廣州民國日報》的「黃花號」和張天化的《血花集》，將這封信加入了「革命烈士文學」的群體，使它負起宣傳革命、洗刷國民黨形象的責任；接下來，它被選入了中學國文課本，成為鼓吹革命與愛國精神的工具，並且呼應抗戰、剿匪、反共等不同歷史階段的政治目的而發展出各式詮釋進路；最後，它在 1980 年代末期逐漸轉型為輔助情感和人格教育的歷史文本，並滋養了通俗文化中的多種懷舊性文化商品。

本文將林覺民其人及〈與妻訣別書〉皆視為歷史之建構物，而非獨立自存的、超越歷史的英雄人物和文學作品，其意義主要來自於刻意的歷史建構和社會文本脈絡的襯托，而其影響也透過這些脈絡而層層傳佈。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流傳與正典化，不僅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封被公開的情書對於民眾愛國熱情的召喚，正與其私密言情特質所散發的「感傷的力量」密切相關。在此，革命論述、言情話語、大眾文化、國家機器四者的影響交互增強，使得這封信成為近現代文學與文化史中最耐人尋味的個案之一。經由媒體的公開發表，革命烈士林覺民的私人情感變成了被大眾審視、崇敬，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效法的對象，而信中的抒情文字，不但轉化昇華了清末以降的「兒女英雄」想像，也成為推廣革命論述的工具，並且被黨國教育體制視為灌輸愛國精神的利器，在中華民國的中學國文教科書中屹立將近七十年，更融入了大眾流行文化，具體呈現了近現代中國言情話語的複雜面向。我們從這封家喻戶曉的情書的生命史中所看見的，是一份真誠的愛如何被國家機器和媒體挪用與變造的過程，亦可看到它所擁有的「感傷的力量」如何與各種政治或教育目的結合，發揮無遠弗屆的影響力，而這種力量，仍然在今日的通俗文化中綿延不息。

附錄：採用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為課文的國文教科書[126]

編　者	書　名	冊次	出版地	出　版　社	初版年分	附　註
朱文叔	初級中學用新中華國語與國文教科書	2	上海	新國民圖書社	1929	篇名為〈林烈士絕筆書〉
朱文叔	初中國文讀本	2	上海	中華書局	1933	
傅東華	復興初級中學教科書國文	5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34	篇名為〈絕筆書〉
夏丏尊、葉紹鈞	初中國文教本	1	上海	開明書店	1937	
蔣伯潛	蔣氏初中新國文	2	上海	世界書局	1937	
宋文翰	初級適用中華文選	4	香港	中華書局	1947	
高明	初級中學國文	1	臺北	正中書局	1950	臺初版
潘成義	初級中學中華文選	4	臺北	臺灣中華書局	1951	臺初版

126 本表僅包括中華民國統治之區域（即 1949 年以前之中國大陸，以及 1949 年以後之臺澎金馬）所使用的中學國文課本，其他時段和區域所使用者不在其列。又，國立編譯館在 1999 年之前所編之國中國文教科書，皆選錄〈與妻訣別書〉一文，故本表僅列出較具代表性之版本，餘不贅錄。無法確認初版年分者，則附註筆者所知之再版時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孫云遐	初級中學國文	2	臺北	復興書局	1952	
王夢鷗、陳鐵凡、唐士毅	興國教科書初級中學國文	2	臺北	正中書局	1952	
臧啟芳等	光華本初中國文教科書	5	臺北	反攻出版社	1953	
陸鐵乘、李曰剛	華國高中國文	2	臺北	華國出版社	1953	
章銳初	啟明初級中學教科書國文	4	臺北	臺灣啟明書局	1954	臺二版
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科編輯委員會	初級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	5	南投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1954	
王夢鷗	華僑初級中學國文	6	臺北	正中書局	1955	
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科編輯委員會	初級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	5	南投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1957	修訂本
高明原編，孫云遐改編	中學標準教科書初中國文	5	臺北	正中書局、世界書局等發行	1967	三版
國立編譯館	國民中學國文科教科書	4	臺北	國立編譯館	1969	
國立編譯館	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	4	臺北	國立編譯館	1975	
國立編譯館	國民中學國中國文教科書	6	臺北	國立編譯館	1987	試用本
國立編譯館	國民中學國文科教科書	6	臺北	國立編譯館	1988	修訂本
國立編譯館	國民中學國文科教科書	6	臺北	國立編譯館	1989	
國立編譯館	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	6	臺北	國立編譯館	1992	改編本

（責任校對：方韻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批：《三國演義》，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

明・熊大木編撰，穆公標點：《楊家將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明・周銓：〈英雄氣短說〉，朱劍心：《晚明小品選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

明　公：〈革命黨之人格〉，原刊於《南洋總匯新報》1908 年 8 月 10 日，收入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五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革命黨列傳〉，《克復學報》2-3 期，1911 年。

嶺南半翁：《辛亥粵亂匯編》（1911？），收入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一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黃世仲：《五日風聲》（1911），桂林：灕江出版社，1988 年。（按：原連載於《南越報》）

帝　民：〈黃花塚記〉，一笑生輯：《繪圖真像廣東近事革黨潮》，出版地不詳：世界最新書社，1911 年。

＊徐枕亞：《玉梨魂》（1912），收入《中國近代珍稀本小說》第 10 冊，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 年。

李定夷：《茜窗淚影》（1914），收入《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 53 冊，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 年。

林　森：〈籌建締造中華民國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紀功坊捐啟〉（1919），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前國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遺集》，臺北：前國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辰紀念籌備委員會，1966 年。

林　森：〈致雲高華國民黨總支部盼助籌建黃花岡烈士紀功坊函〉（1919），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前國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遺集》，臺北：前國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1966 年。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致全國討賊將士函〉，《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漢口檔案》，1924 年 1 月 20 日。

〈全國代表大會各種重要提議 • 請議撫恤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遺族〉，《中國國民黨周刊》10 期，1924 年 3 月 2 日 4 版。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公祭黃花崗先烈通告〉，《中國國民黨周刊》18 期，1924 年 4 月 27 日 8 版。

＊林覺民：〈林覺民寄妻書〉，《廣州民國日報》，1924 年 5 月 2 日 2、3 版。（按：即〈與妻訣別書〉）

田　漢：〈黃花崗〉，《大公報（長沙版）》1925 年 5 月 28 日副刊。

田　漢：〈黃花崗〉（長篇革命史劇），《中央日報》1928 年 2 月 4 日第 3 張第 4 面。

＊張天化編：《血花集》，上海：民智書局，1928 年初版。

陳布雷：〈在黃花岡烈士紀念會演說詞〉，孫云遐編：《初級中學國文》第二冊，臺北：復興書局，1952 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年。

《上海民國日報》（影印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

＊《民立報》（影印版），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 年。

《申報》（影印版），上海：上海書店，1982-1987 年。

《香港華字日報》（微卷），香港：香港華字日報社編。

《時報》（影印版），香港：蝠池書院，2006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神州日報》（微卷），上海：神州日報出版社編。
＊《廣州民國日報》（影印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聯合知識庫》，聯合報社編，http://udndata.com/library/，2014 年 2 月 4 日讀取。

二、近人論著

〈林森〉，黃季陸主編：《革命人物誌》第二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 年。
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科編輯委員會編：《初級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第五冊，南投：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5 年。
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科編輯委員會編：《中學標準教科書初中國文》第五冊，南投：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9 年。
王夢鷗編：《華僑初級中學國文》第六冊，臺北：正中書局，1955 年臺初版。
平襟亞：〈「鴛鴦蝴蝶派」命名的故事〉，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 年。
＊呂芳上：〈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後的宣傳刊物〉，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第四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 年。
呂芳上：〈辛亥三二九廣州之役〉，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一篇「革命開國（一）」，臺北：國立編譯館，1985 年。
＊朱文叔編：《初級中學用新中華國語與國文教科書》第一冊，上海：新國民圖書社出版，中華書局印行，1932 年。
宋文翰編：《初級適用中華文選》第四冊，上海：中華書局，1947 年 7 版。
宋文翰編：《新編初中國文》第一冊，上海：中華書局，1941 年。
宋文翰編：《新編初中國文》第二冊，上海：中華書局，1941 年。
宋文翰編：《新編初中國文》第三冊，上海：中華書局，1941 年。
宋文翰編：《新編初中國文》第五冊，上海：中華書局，1941 年。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4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 年。

林天立：〈英傑正氣．永世長存——紀念祖父林覺民就義八十週年〉，《中央日報》，1991 年 10 月 3 日 17 版。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國文科教科書》第四冊，臺北：國立編譯館，1971 年。

國立編譯館編：《國民中學國中國文教師手冊》第六冊，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 年。

國立編譯館編：《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第六冊，臺北：國立編譯館，1992 年改編本初版。

教育部頒行：《修正初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上海：正中書局，1946 年。

＊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19 卷 1 期，2001 年 6 月。

梁群球主編：《廣州報業（1827-1990）》，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 年。

章銳初編：《啟明初級中學教科書國文》第四冊，臺北：臺灣啟明書局，1954 年。

莊適編：《現代初中教科書國語》第二、四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年初版、1932 年國難後 2 版。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收入《陳平原小說史論集（中）》，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陳進金：《抗戰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7 年。

陸鐵乘、李曰剛編：《華國高中國文》第二冊，臺北：華國出版社，1953 年初版。

馮自由：〈上海神州日報小史〉，《革命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臺 3 版，頁 258-264。

董健主編：《中國現代戲劇總目提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司，1996 年。

臧啟芳、李雄等編著：《光華本初中國文教科書》第五冊，臺北：反攻出版社，1953 年。

趙景雲：〈英雄本色兒女情長——林覺民〈與妻書〉賞析〉，《新聞與寫作》2006 年 5 期，頁 39-40。

潘少瑜：〈國恥癡情兩淒絕：林譯小說不如歸的國難論述與情感想像〉，《編譯論叢》5 卷 1 期，2012 年 3 月，頁 97-120。

＊潘少瑜：《清末民初翻譯言情小說研究——以林紓與周瘦鵑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柯慶明先生指導，2008 年。

蔡世明：《近百年來我國中學國文教學的發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 年。

鄭逸梅：《尺牘叢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戴叔清編：《初級中學國語教科書》第四冊，上海：文藝書局，1933 年。

癡　萍：〈春柳始末記〉，周劍雲編：《菊部叢刊・歌臺新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4 年。

蘇雪林：〈林琴南先生〉，朱傳譽主編：《林琴南傳記資料》第三冊，臺北：天一出版社，1981 年。

龔鵬程：〈俠骨與柔情——論近代知識份子的生命型態〉，《近代思想史散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年。

（美）費約翰（John Fitzgerald）著，李恭忠、李里峰等譯：《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北京：三聯書店，2004 年。

（美）Tompkins, Jane P. *Sensational Designs: 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Fiction, 1790-1860.* (聳動的設計： 1790 至 1860 年美國小說的文化工程)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說明**：書目前標示＊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elected Bibliography

Guang zhou min guo ri bao [The Min Kuo Daily News, Canton] (Rep. ed.). (1985). Beijing: People's.

Lin, J.-M. (1924, May 2). Lin Jue min ji qi shu [Lin Jue-Min's letter to his wife]. *Guang zhou min guo ri bao* [The Min Kuo Daily News, Canton], pp. 2-3.

Lu, F.-S. (1994). Zhong guo guo min dang gai zu qian hou de xuan chuan kan wu [Propaganda publications before and after KMT's reorganization]. In Li Y.-H. (Ed.), *Zhong guo guo min dang dang shi lun wen xuan ji* [Selection of academic papers on the history of KMT] (Vol. 4, pp. 93-127). Taipei: Modern China.

Mei, Ch.-L. (2001). "Discovering youth" and "imagining China": Modernity,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Liang Qichao's "The youth of China." *Chinese Studies, 19*(1), 249-276.

Min li bao [Min Li Pao] (Rep. ed.). (1969). Taipei: Commission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Pan, Sh.-Y. (2008).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foreign love stories: A case study of Lin Shu and Zhou Shouju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Shen zhou ri bao [The National Herald] (Microfilm). Shanghai: Shenzhou Daily.

Xu, Zh.-Y. (1997). *Yu li hun* [Jade pear spirit]. In *Zhong Guo Jin Dai Zhen Xi Ben Xiao Shuo* [Modern Chinese rare novels]: *Vol. 10*. Shenyang: Spring Wind.

Zhang, T.-H. (Ed.). (1928). *Xie hua ji* [Collection of blood drops]. Shanghai: People's Knowledge.

Zhu, W.-Sh. (Ed.). (1932). *Chu ji zhong xue yong xin zhong hua guo yu yu guo wen jiao ke shu* [New Zhonghua national language and national literature textbook for junior high school] (11th ed., Vol. 1). Shanghai: New Citize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